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言及俄国知识分子的三本书

白雪公主，她是谁？

危机中的苏坎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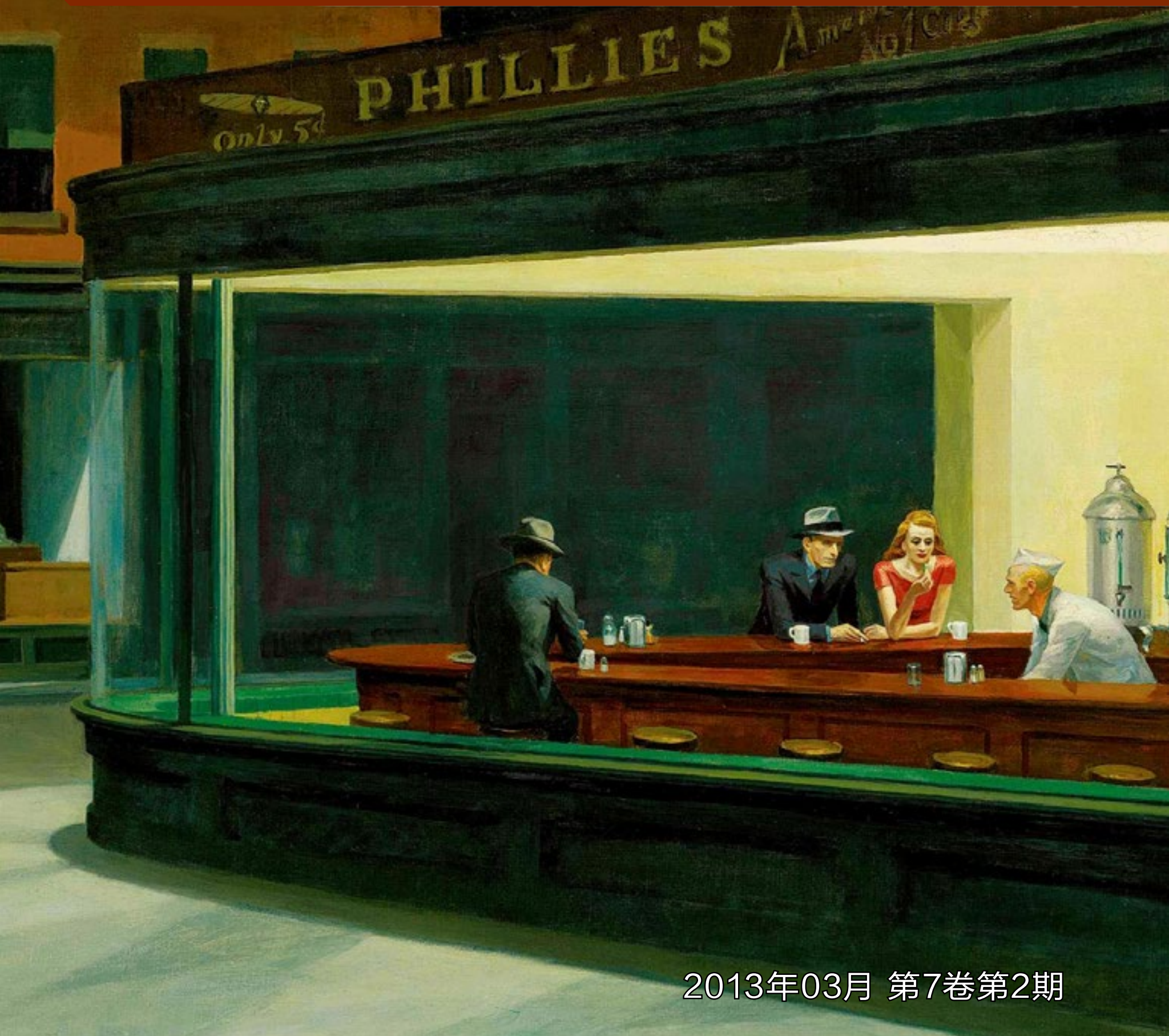
“东瀛履痕”之二

——东京文学地图：上野

布拉格访“共产主义博物馆”

平生风义兼师友

——怀念张晖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汪 伟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孙骁骥 刘承周

观察员

文学：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 良（北京）
刘 柠（北京） 严 飞（美国·旧金山）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 克（德国·图宾根）
灵 子（北京） 燕 舞（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米 格（广州）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北京）

2013年03月 第7卷第2期

总第63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曾经替朋友代过几节早教班的美术课。如果不刻意去引导的话，就会发现小孩子对色彩的自由表达能力都很强，甚至会令人匪夷所思。比如空气，他们多半都认为应该有一个色彩属性。当你要求他们画下来的时候，就能看到在这些作品中间，固然是蓝色占据了相当一部分，但也有红色、黄色、甚至绿色和赭石色。

红色、黄色可以理解为朝霞与黄昏，毕竟在少儿的认知系统中，将“天空”和“空气”混淆是很正常的，但那些绿色和赭石色，却并非成年人认知系统能够理解。问及原因，他们会告诉你，绿色是春天的空气，赭石色是他心情不好时的空气。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色彩”的概念已经被这一类孩子从具象中抽离出来，成为了一种个体化、独立的表现形式，并与另外的感受联系起来，与康定斯基后期的一些色彩理论相暗合。

我经常 would 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成年人的世界中，绝大多数人认为空气没有颜色？是否我们受外界干扰所致，以至于我们终于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失去了对不同事物之间“通感”的敏锐，乃至失去了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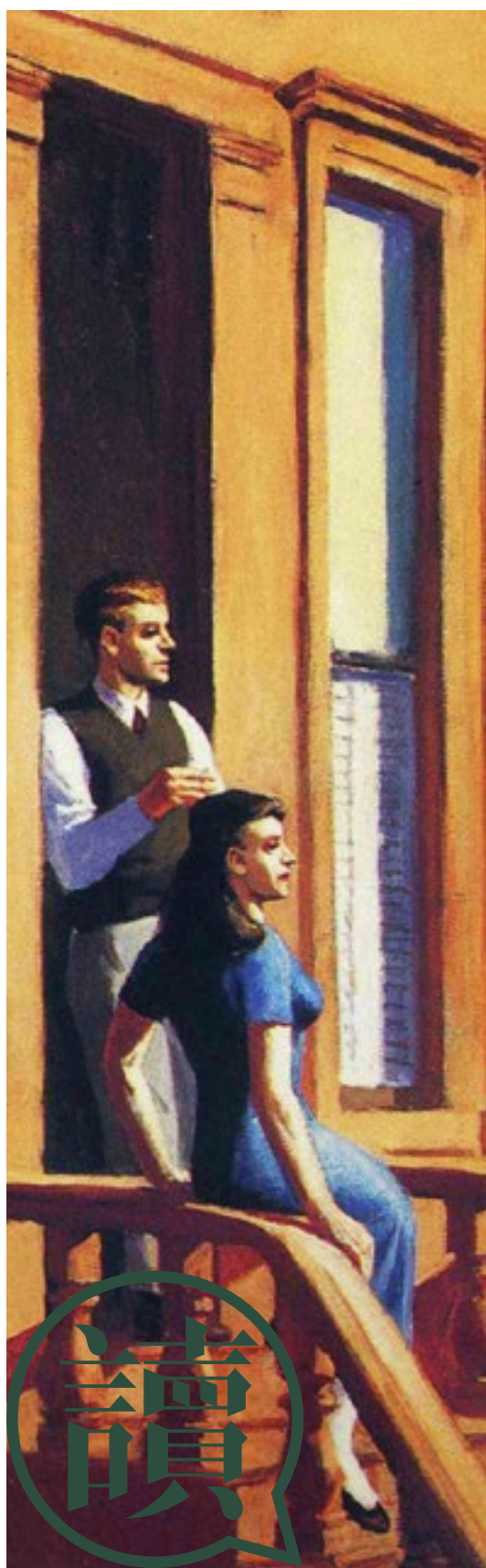
外界干扰不限任何媒介，它借助一切手段向每个个体灌注它的价值观。特别是在今天这种信息渗透力超强的时代，它正如北京窗外的大风，裹挟了无数碎片化信息，扑向每个人，将千里之外的小颗粒抛给我们，拿走的却是独立思考 and 自由呼吸的空间，并将我们本身多彩的“空气”撞击至无色。

北方的大风，虽然能吹散沉重的雾霾，但前方的道路是什么颜色，未必就能够因此而清晰。



目录

封面用图
Nighthawks
Edward Hopper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文 史 • 王晓渔

005-006

阅读报告
台港海外

美 国 • 罗四鸰

007-009

书评

• 孙传钊
言及俄国知识分子的三本书

010-014

随笔

• 罗四鸰
白雪公主, 她是谁?

• 杨晓刚
危机中的苏坎普

015-020

游记

• 刘 柠
“东瀛屐痕”之二
——东京文学地图: 上野

• 邵浴日
布拉格访“共产主义博物馆”

021-043

逝者

• 维 舟
平生风义兼师友
——怀念张晖

044-060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 wangxiaoyul978@sina.com）

十五年前，三联书店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共十种：江藩、方东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王韬《弢园文新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万国公报文选》、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章炳麟《馗书(初刻本、重订本)》、《康有为大同论二种》、《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全套定价488元，以当时的书价标准而言，无异于天价，当时我尚在求学期间，望而却步。后来这套书逐渐在书店消失，有些有了新版，有些却从此绝版，再想购买，价格又在孔夫子网翻了一番或两番。这几年，孔夫子网的旧书行情，已经接近于几年前日新月异的房市。

去年中西书局再版这套丛书，终于得以补充其中几种，如《万国公报文选》等。意外的是，经过十五年，新版全套定价竟然比初版略有下降，只有430元，厚道之至。装帧略为简洁，但正合吾意，抛开价格的因素，我一向喜欢简装本，精装本实在不太适合我躺着读书或坐在地上读书的习惯。只是繁体直排改成简体横排（《煊书（初刻本、重订本）》、《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依然是繁体横排），略有遗憾。

在重版前言里，执行主编朱维铮先生透露了这套丛书出版之坎坷：丛书1988年启动，两年编成，却历经八年才得以出版；最初准备



五年出版晚清编三十种，最终却只有十种。可惜他没有透露另外二十种的目录，也不太清楚他是否已经编好目录，只是提及钱锺书先生将拟选的陈炽《庸书》删去，这一细节颇有意味，但不知原因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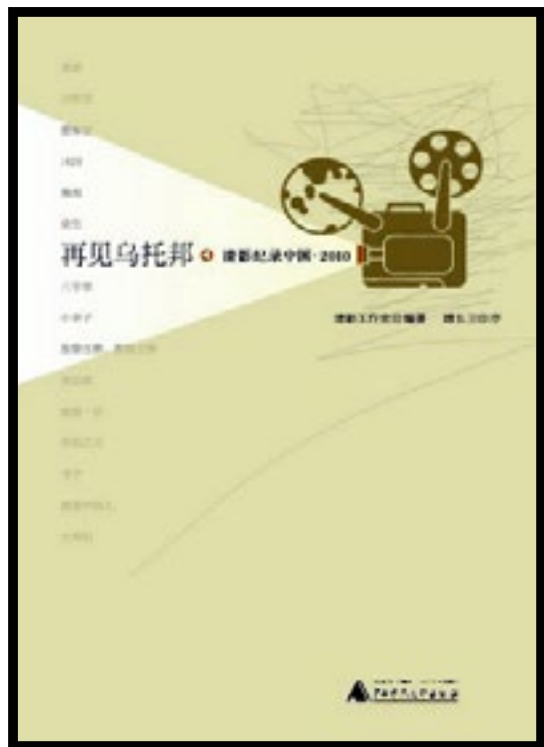
199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是一套值得再版却没有再版的丛书。这套书共有20种，其中《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筹洋刍议：薛福成集》、《采西学议：冯桂芬 马建忠集》尤为难得。何启、胡礼垣至今受到的关注依然与他们的价值不成正比；薛福成的著作虽有“无锡文库”的《薛叔耘遗著十六种》（凤凰出版社，2011

年),但两册定价950元;冯桂芬的著作不难寻觅,但马建忠的著作除了语言学名著《马氏文通》不断再版,谈论西学的著作似乎只有这个版本,一热一冷颇堪回味。除此之外,中国书局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也有很多亟待再版,如《严复集》几乎让人望穿秋水。

出版社不愿重印这些书籍,也可以理解。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近代文献丛刊”,共有十种:《瀛环志略》、《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翼教丛编》、《自西徂东》、《佐治刍言》、《文学兴国策》、《弢园文录外编》、《校邠庐抗议》、《劝学篇》。这些著作在近代中国具有重要影响,除了最后三种,其余此前均未曾标点出版。定价从6.5元到29.5元,可谓物美价廉。但是至今在打折书店经常见到,有时不忍它们零落成泥,虽然手边已有,还是会再买一些复本。

这几年,各地纷纷出版地方文库,比如湖南出版“湖湘文库”、广东出版“岭南文库”,做了很多拾遗补缺的工作。但是,定价往往不菲,或许这本来就是政府的形象工程,主要供党政机关陈列,不是供学者研究之用,也或许考虑到物美价廉同样无人问津,索性做出奇货可居的样子。如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单本定价130元——不过虽然抱怨,还是会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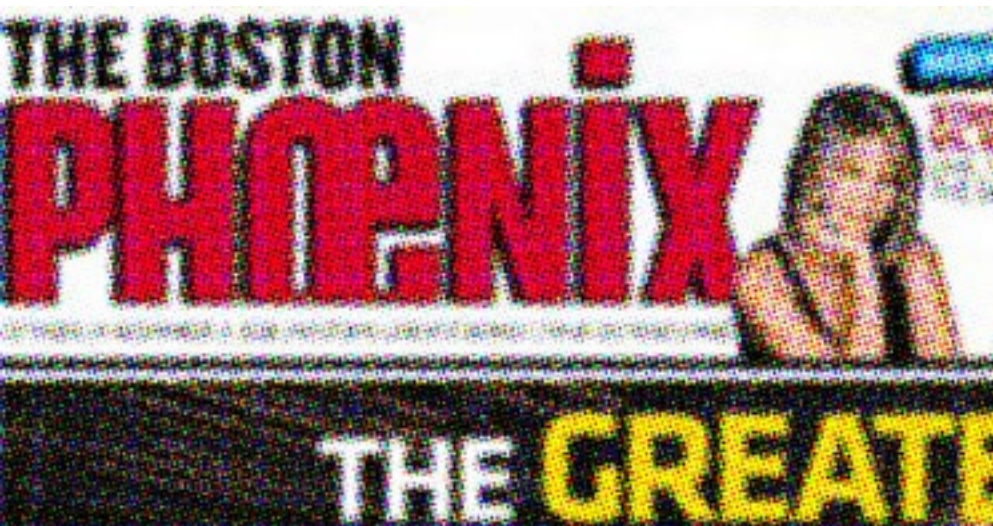
如果未来回看近一二十年的历史,不仅有文字,还有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料:独立纪



录片。独立纪录片兼有文献的和艺术的价值,遗憾的是空间非常有限。清影工作室从2009年开始,免费播放了150余部纪录片,并将导演访谈结集为《算命》、《再见乌托邦》和《活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虽然没有去过清影工作室的现场,但通过其他种种渠道,我看过张以庆的《幼儿园》、徐童的《算命》、冯艳的《秉爱》、王利波的《掩埋》、范立欣的《归途列车》……可以这样说,谈论当下的中国,如果无视独立纪录片,那是一个巨大的缺失。尽管这三本书对纪录片导演有不少重要的遗漏,访谈也稍显随意而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但是对于想了解纪录片却很难有渠道接触的读者来说,是不错的导览。Q

“你还好吗”

特约撰稿人 罗四翎 (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3月14日下午6点51分,《波士顿凤凰报》(Boston Phoenix)在官方推特上发了一条令人有些心酸的信息:“谢谢波士顿。晚安并祝你好运。”(Thank you Boston.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仅仅在六个月前,这份双周报还进行了全新改版,从一份小报改版成八卦杂志,但终究未能逃脱此命运。3月15日发行最后一期后,这份在波士顿地区发行了47年的报纸划上了最后的句号,网络版则在3月22日停止更新。其兄弟媒体《普罗维登斯凤凰报》《波特兰凤凰报》《缅因凤凰报》虽继续发行,而命运依然令人堪忧。《波士顿凤凰报》执行主编Peter Kadzis形容,整个凤凰传媒集团已经“岌岌可危”,而“要保留《波士顿凤凰报》一年要花1百多万美金。”在3月13日星期三的宣布停刊的会议上,当场有人哭泣,然而结局依然无奈:四十名职员在本周内离去,剩下

的十名随后离去。甚至连遣散费都没有。

对于《波士顿凤凰报》的结束,凤凰传媒总裁Stephen Mindich形容,“虽然很悲伤(SAD),但并不对此感到内疚。”他说,在做决定之前,他曾向本地一些有钱人寻求帮助,以便让这份报纸存活。而他得到的回答非常一致:“你疯了吗?”在问到下一步打算时,他说,“我需要喘口气。”虽然《普罗维登斯凤凰报》《波特兰凤凰报》依然发行,但他表示,若是他不再信任它们,他将不再保留。当问到“你还好吗?”Stephen Mindich则幽默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好比问“林肯夫人,那个戏怎么样?”

无独有偶,4天后的3月19日,好莱坞的权威刊物《综艺包》(Daily Variety),在出版最后一期后也宣布停刊,今后只发行网络版。《综艺报》由著名报人赛姆·西尔弗曼于1933年在好莱坞创办,每周出版5期,至今已有八十年的历史。但随着网络和电子媒介的兴起,其辉煌亦成过去。该报出版人米歇尔·索布里诺甚至表示,“从经营的角度上看,继续发行报纸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传统报业和纸质媒体会消亡吗?去年11月,就连报业王牌英国《卫报》也宣称将缩减印刷版业务;而美国《新闻周刊》从今年一月起停止发行纸质印刷版,改为数字版。

在继2011年第二大连锁书店Borders倒闭后，今年2月第一大连锁书店Barnes & Noble也传来危险的信号：因租金问题，Barnes & Noble将关闭首都华盛顿特区联合车站的店面，虽然四十年来这家书店已成为一个坐标。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地球对面，因租金问题不得不迁址的北京的万圣书园和上海的季风书店，不由得感叹，是谁让这行当，成了黄昏里的一盏灯？

“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在得知《卫报》要缩减纸质版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专门撰文，捍卫传统纸质书报。或许，他是对的，有时梦想也能照进现实，2月，迎来50岁生日《纽约书评》或许能给些许的安慰。

1963年初的一个下午，35岁的编辑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与47岁的作家评论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偶然在纽约哥伦布街头相遇，于是，她们约了一个饭局。晚上，她们与她们的丈夫出版商杰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与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一起西六十七街爱泼斯坦家的公寓中吃饭。在饭桌上，四人聊起了当时纽约市印刷工人的罢工，罢工造成的多种报刊的停刊，并对当时的书评极为不满。哈德威克当时在《哈泼斯》杂

志上撰文痛斥，充满了“千篇一律的赞扬和模糊无力的异议，风格阙如，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不投入，没热情，无性格，也不反常，总之就是没有文采。”由于严肃书评的衰落，“一本书生下来便掉进了蜜罐。”于是四人发现天赐良机，为何不创办一份他们想要的那种书评媒体呢？“不然就永远别再抱怨。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也没退堂鼓，因此也就没有讨论。机会——其实是责任——已经摆在了面前，我们没有视而不见。”

第二天，他们便开始筹钱，并邀请当时的青年才俊、《哈泼斯》杂志编辑罗伯特·西尔维斯(Robert Silvers)与芭芭拉·爱泼斯坦一起主编这份杂志。杰森·爱泼斯坦当时还在兰登书屋做图书编辑工作，所以和编务保持距离，而负责发行和预算。1963年2月1日，《纽约书评》第一期刊世，“编者按”中写道：“《纽约书评》并不想假装覆盖到本季度所有的书，甚至所有重要的书。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用在那些著书目的微不足道或是只为赚钱的流毒书籍。”头条是FW·杜皮的长文《詹姆斯·鲍德温与“人”》，当期文章来自四十五位作者，有诗人奥登、作家诺曼·梅勒、作家和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小说家威廉·斯泰伦和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书评，以及约翰·贝里曼和罗伯特·潘·沃伦的新诗。此外还有兰登书屋的整版广告，推销作家约翰·奥哈拉和杜鲁门·卡波特的新文集。《纽约书评》一创刊便广受欢迎，“第一期售罄后，我们收到近千人的来信要求我们继续

下去，这就是《纽约书评》的开始。”从此，这份刊物成为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思想性刊物之一，直到今天。五十年来，其发行量始终维持在十万份左右。对于这份当时定价25美分的创刊号，《纽约客》主编大卫·雷姆尼克在2006年写道，这“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份杂志创刊号”。

50年过去，当年的饭桌四君子仅剩杰森·爱泼斯坦。3月，85岁的杰森·爱泼斯坦为此写下回忆文章《一次罢工与一个开始，〈纽约书评〉的创刊》，讲述了他们的故事。《纽约书评》也重印了当年的创刊号，分发给前来参加五十周年庆典的人。

2006年，两位主编之一芭芭拉·爱泼斯坦去世，今年已84岁的罗伯特·西尔维斯，从创刊至今，从未离开这份令人尊敬的书评杂志。他亲自编辑每一期书评，还阅读几乎所有的读者来信。面对电子化阅读的挑战，他认为，世界上缺少长篇的、严肃的评论是不可思议的。在庆典上，有读者问：“你的下一个50年，你最希望做什么？”西尔维斯说：“我必须告诉你，我在过去的50年里，时间不是一天一天算的，而是一小时一小时计的……这就是将来也会发生的事。”



言及俄国知识分子的三本书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北京, sunchuanzhao@yahoo.com.cn）

金雁的《倒转红轮》成为畅销书的最近，凑巧我刚先后读了三本涉及俄罗斯知识分子议题的书，可能也都是中国读者有兴趣一读的。

第一本书是日本学者森冈真史的新著《鲍利斯·布鲁茨库斯的一生及其思想》（ボリス・ブルツクスの生涯と思想，2012年）。森冈真史的研究主要叙述、分析了布鲁茨库斯的经济思想，虽然也涉及其关于民族问题、特别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观点。鲍利斯·布鲁茨库斯（Boris Brutzkus, 1874-1934）俄国犹太人，和米塞斯、哈耶克一样，是20世纪著名的反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研究农业经济专家。在沙俄时代，面对帝政末期的土地改革，他的观点是：俄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土地少，而是剩余劳动力过多。传统的农村共同体分割了土地之后，加剧了剩余劳动力增加。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有效的做法是

发展工业，促进城镇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职业分化。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批判十月革命后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为此，受到迫害，不得不离开俄国，流亡到柏林。在德国，他继续关心祖国的动向，研究分析“新经济政策”、“消灭富农”、农业集体化等运动。纳粹上台后，他又逃往耶路塞冷，1938年在那里长眠。布鲁茨库斯指出，布尔什维克这一系列政策，实际与沙俄时期，农村共同体传统有关，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信仰。十月革命后的农业危机、饥荒的产生固然应该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传统的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免除自己的责任，他们强调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是错误产生的根源。这种对土地的执着，是一种实物经济观念。相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实物经济观念，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劳动的权利。虽然这种实物经济理念，从伦理学来看，维护农民耕作利益，是

正当的,但是从经济学观点来看,这种观念产生是因为沙俄时代农民意识的局限,他们没有意识到农耕之外还存在其他劳动的可能、劳动的权利,而且还妨碍土地更有效的利用。问题是俄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批判这种观念,反而成了农民这种传统观念的尾巴。鲍利斯·布鲁茨库斯认为这种对土地执着斯·、对集体所有制共同体的憧憬背后孕育着更严重的问题。即俄国知识分子追求一种不受任何现实条件限制的理想社会,这种十全十美的追求使得他们的理想截断了现实,与现实分离。而且为实现这种理想,他们认为可以摆脱一切客观条件限制,可以为了美好的目的不择手段,即使使用暴力和谎言也在所不辞。

笔者认为森冈书中还有没有深挖的一条线索。布鲁茨库斯之所以对上述两个问题敏感,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内中有两个历史要素:因为沙俄时代,是一个反犹太思潮十分严厉、盛行的历史时期,犹太人遭受迫害的结果,不少犹太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促成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中犹太人占据很高比例。关于这一点,萨罗·巴隆和列纳特·夏皮罗已经有很详尽实证研究(Salo Wittmaler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Sovieets, 1987; 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64)。其二,以东欧移民为主体的巴勒斯坦犹太移民(今以色列)中,至今,还保留了基布茨这种源于俄罗斯平等主义的乡村共同体。托尼·朱特在《记忆小屋》中回忆:他从中学时代就关心作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环——



源自俄罗斯平等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乡村共同体”——左翼复国主义运作的“谁也不剥削人、不受人剥削”的基布茨。15岁时他曾投身于以色列的乡村基布茨共同体中,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里单纯的生产劳动不能满足自己好学的求知欲,特别使他反感的,1976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一爆发,基布茨里的“勤劳”、“朴实”的村民,马上都暴露出迷信暴力、好战的本相。(《记忆小屋》,日文版101页)

读到的第二本与俄国知识分子论题有关的书是赛尔盖·彼得洛维奇·梅里戈罗夫《苏联的红色恐怖: 1918-1923》(日文版)。著者梅里戈罗夫旧贵族出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在读时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该党左翼在十月革命后短时期内曾一度与布尔什维克共同执政,不久也成为革命的对象。梅里夫戈罗也因为反对

暴力、恐怖几度入狱。1922年不得不离开苏联。流亡国外。该书反映苏俄的暴力、恐怖并非自斯大林掌权后才有，在列宁时代对反对派镇压就异常残忍。全书自头到尾都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事例。随便举几个，比如，实施人质政策，把报复对象扩大对对象的儿女、妻子、亲族和友人——无辜的人，数倍枪杀。再如：为了避免协约国的指责，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签署了一个对政治犯的大赦令，但是在通告公布的实施日，前一天各地监狱抓紧最后时机，一夜杀了几百，总数达几千的第二天应该获释的囚犯，而且一些地方的契卡还宣言地方特殊，拒绝执行捷尔任斯基的大赦令，继续大肆屠杀。又如，内战结束后，政府公开承诺，欢迎流亡在国外的哥萨克回国，对绝大多数不予追究，但是，大批回国的哥萨克，其实60%都遭到杀害，等等。梅利戈罗夫书1923年在柏林出版，1990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再版，1996年再版的版本，还增加了许多当年的照片。该书援引材料出处，都是当年的媒体或文件，大部分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或公开的文件。日文版的译者俄国政治史研究者尾川伸一教授说，按照他手头所掌握的史料，书中所述的事件大部分都能得到证实。马上引起我阅读兴趣的却是梅里戈罗夫书的开头这么一段叙述：

我在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的最初5年是生活在苏联，1922年10月我离开了俄罗斯。最初滞留在华沙。在那里一个偶然的机

女共同经营的咖啡馆里，一个端送咖啡的妇人突然向我发问：“你是最近从俄国来的俄国人？”

“是呀！”我回答。

“有个问题要问你，为什么俄国想要杀掉列宁和托洛斯基的人一个也没有？”

这是个没有预期到的质问，我一下子愣住了。因为这几年在俄国失去了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当然我还是告诉了这位妇人自己的个人想法：反对自古以来那种恐怖行动，暗杀并不能达到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但是，那妇人说：

“杀了其中某个人，就可以拯救几千人的生命。为什么沙俄时代社会主义者有救他人愿意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为了报仇实施暗杀大有人在？为什么现在委屈忍辱面对如此暴力不去复仇？每个人都有兄弟、儿女、妻子呀！为什么他们为了报仇下不了手？我真不明白！”

我想且不谈公民权利和伦理问题，也一定要从良心出发回答这位妇人的问题。我想：人的生命一文不值的俄国的现状，必须思考的是如何阻止所有的恐怖分子，他们采用的政治行动和个人报复，即使是以祖国的名义，也只会带来成千上万的无辜的受害者。何况，以前只是处罚直接实施者，最多牵涉与实施者有关的小集团，但是，今天不是这样，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是最近几年所发生的。

这一段至少显示出以下两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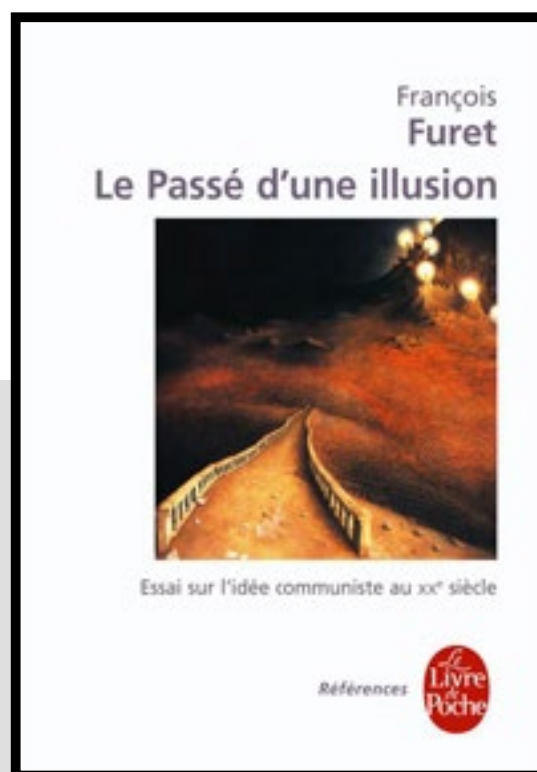
1.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有采用暗杀手段，以求政治报复的传统。该书也提到：

1879年民粹派分裂出来的组织“人民的意志”的逻辑是在自由的国家里，开展公平的意识形态斗争，在专制国度里只有搞政治暗杀。就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恐怖活动，1881年暗杀亚历山大二世，遭到镇压后，才逐渐颓势。

2.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报复残忍程度，远远超过沙皇时代的暴力恐怖的程度。

从这两点，我们可以推论：1，十月革命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因为极端恐怖（株连家族、朋友），都丧失了反抗意志，也已经没有反抗的空间；2，乌托邦幻想带来的体制是历史上前所未有，不只是残忍程度，而且摧毁、颠覆了人类三千年文明史以来所有的伦理规则，所以产生了一个“极权主义”概念，不是历史上其他所有的独裁政体、个人暴君所能比拟的。作为此书延伸阅读，安·鲍·祖波夫的《20世纪俄国史：1894-2007》和安·阿普莱勃姆的《古拉格：一段历史》（anne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也有非常详细的记叙。

第三本言及俄国知识分子的书是弗朗索瓦·傅勒的《幻想的过去》（Le Passé d'une illusion, 1995）。书名中的“幻想”是指20世纪中极右、极左两种乌托邦的幻想——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傅勒和另一位保加利亚出身法国学者托多罗夫一样，论述极权主义的斯大林时代的知识分子时，特别推崇瓦西里·格罗斯曼，对其评价似乎还要高于索尔仁尼琴索。傅勒和托多罗夫在《恶的记忆·善的诱惑》中同样，



在《幻想的过去》中第12章压轴有一节专门介绍、评价格罗斯曼。傅勒对格罗斯曼作很高的评价理由大致是这样的：格罗斯曼在斯大林尚未去世的1950年代初就开始“转向”，要摆脱创作的枷锁，到60年代毅然决然告别斯大林主义。标志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人生与命运》（1980年代也有了中译本）。只是其生前作品未传到西方，不为外界所知。其转向不仅较其他知识分子早，而且思想转变过程很短。即他作为随军记者，卫国战争末期反攻途中，1944年9月他在纳粹消灭痕迹的蛛丝马迹中发现了纳粹的种族灭绝的集中营的惨状，率先写成报道《特雷布林的地狱》，发表在《赤旗报》上。此后到1952年为止那几年中，他又创作了小说《为了正义》，描写战时俄国人民和犹太民族的苦难，但是，由于书中涉及犹太人内容过多，开始只能断断续续刊出其中一些片断，几经曲折才得以问世。到1961年

冬天，他最后写作的小说《人生与命运》稿子一直被扣押在克格勃那里。因为小说作者想表达这样一个主题：一，人民浴血奋战想通过战争产生一个自由的新苏联，但是，苏联的对德战争，结局无论是胜利还是战败，人民依然处于奴役之中；二，对犹太人、对民众的迫害的角度来说，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苏、德两国，有同质政治构造。傅勒说：“苏联所有的作家都不具备格罗斯曼那种理解犹太人不幸的想象力，也没有人有勇气把犹太人的不幸说出来！”——因为斯大林是反犹的，该体制下犹太人是歧视和被边缘化的对象。也因为格罗斯曼犹太人的自我认同和发现纳粹集中营的经历让他“先觉”。傅勒说格罗斯曼和索尔仁尼琴不同的，一个抛弃了宗教，一个皈依了基督教。格罗斯曼对两种乌托邦幻想的极权体制同质性的认识正是傅勒和托多罗夫所重视的，认为在苏联知识分子中是难能可贵的。我想可能是，傅勒战后（1949-1956年）为斯大林体制所惑，一度是法共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托多罗夫出身于保加利亚，有20多年斯大林体制下生活的经历，所以他俩特别看重格罗斯曼这种同质性认识。

另一方面，正像傅勒在《幻想的过去》中分析那样，1970年代之前有很长一段，法国的知识界大多数人都不认同北美政治学学者所肯定的“极权主义”这个概念。（1970年代后，相反，法国知识界开始接受这个概念，美国新一代学人多否定这个概念。）1980年代参与德国的“历史学家论争”中，傅勒属于修正主义一派，和恩斯特·诺尔特共著《带着敌意的靠近：20世纪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其生前最后一部巨著《幻想的过去》中还坚持支持恩斯特·诺尔特的立场。

顺便说一下，《幻想的过去》和布朗的《共产主义之兴衰》（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不同，后者主要叙说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前者主要叙述20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两种极权主义的反应。傅勒的多种著作我很喜欢，比如，他在《幻想的过去》开头，就不隐瞒谈及自己7年党员的历史和责任，这是许多人做不到的。可惜我国出版界只出了他的一本《思考法国大革命》，他的《法国革命论》、《马克思与法国革命》都没有翻译成中文，是很遗憾的事情。Q

白雪公主，她是谁？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luosiling@gmail.com）

从前，有两个德国兄弟，喜欢收集他们那个年代的民间故事，他们收集了一批关于王子与公主、森林、城堡以及巫术的故事。1812年12月20，他们收集的86个童话《儿童与家庭故事》出版，三年后，又出版了第二卷70个童话故事。这两卷便是日后享誉世界的《格林童话》。初版的《格林童话》刚问世时，遭到一片批评，其中一个批评来自格林兄弟“民间文学”研究的引路人、海德堡浪漫派创立者之一柯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就整体而言，太让我失望了，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所谓忠实地记录下来的民间童话，没有任何意义，肮脏，故事又非常短，实在是无聊至极。”可以想见，第一版《格林童话》的销售业绩非常差，几年后，格林兄弟决定出版第二版，并从学术路线改走为儿童路线。在1819年第二版的序言中，他们去掉了之前忠于民间故事来源的宣称，而是慎重地宣称：“任何不宜青少年阅读的内容都被删除了。”

因此，第二版删去了初版中的34个故事，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过于血腥和暴力，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孩子们玩屠宰游戏的故事》：在长约一页纸头的童话里，讲了两个孩子们玩屠夫杀猪游戏的故事。第一个故事中一群孩子把一个孩子杀害。第二个故事中，一家人互相杀害，全部死绝。因此，这个故事被和谐掉了。当然，被和谐的不仅于此。从1812年初版到1857年第七版，在这45年时间里，格林兄弟，尤其是弟弟威廉·格林，不断对童话集进行增减和润色，删除暴力以及可能引起的性联想的描写，“以符合读者的期待”，如将一次次欲置白雪公主于死地亲生母亲改为恶毒的继母，解救她的人则从父亲变成一位年轻英俊的王子，一个颇具人类学意味的故事终于变成一则“公主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1859年，73岁的威廉·格林去世，于是，1857年的“洁版”《格林童话》成为最终版本，也是如今我们常见到的版本。

即便如此，洁版童话中所包含或隐喻的弑父杀母、父食子、母食女、肢解、食人、偷情、怀孕、乱伦、谋杀等情节，依然为人所诟病。近日，为了纪念“格林童话”200岁生日，在这两兄弟——雅各布·路德维希·卡尔·格林(Jacob Ludwig Karl Grimm)和威廉·卡尔·格林(Wilhelm Karl Grimm)的故乡——德国，启动了2013年近乎一年的纪念活动，如何看待“格林童话”在德国文化中的身份和地位成为这场盛大纪念活动首当其冲的话题。“德国人为什么会犯下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恶行？”对此，德国作家金特·比肯费尔德认为在“格林童话”中能找到答案。

将“格林童话”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这一个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78年，德裔美国学者路易·斯奈德便在《德国民族主义根源(Roots of German Nationalism)》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阐述了格林兄弟对德国民族性格的形成的负面作用，如“服从、处罚、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和美化暴力”。因此，《格林童话》在德国幼儿园被禁几十年。然而，在我看来，与“格林童话”残暴的内容本身相比，更需要重新思考是格林兄弟对待童话的残暴的方式，将有着丰富可能性的民间故事规训为一种简单的同一的模式：美丽的必定善良必定有好结局，丑陋的必定邪恶必定没好下场，有着丰富意义的民间故事都被规训为一种纯洁的高尚的模式。且不说有没有必要为了儿童而取消故事与现实的丰富性，单单这种对同一模式的追求，就是最危险的。在忧郁的阿多诺看来，正是西方文明中这种对“同一”的理性追求才导致了



集中营。将数百万犹太人、同性恋者、残疾人、吉普赛人、少数民族等全部屠杀的事实是“野蛮”的，但在阿多诺看来，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野蛮过程所表现出的“理性追求”——对某种纯洁、崇高的追求。在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最后，阿多诺悲愤地追问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荒谬：为什么法西斯分子正是在追求纯粹的本质（种族）同一性中，听着西方古典音乐来进行恣意杀戮的呢？

套用阿多诺的话，无论是在童话中，还是现实中，“应该被认识的东西也许类似于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崇高的东西”。为此，我很愿意推荐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给沉醉于“格林童话”的人，那个有烦恼、有心事、有嫉妒、有压抑，想入非非忿忿不满充满女权意识的女人，难道不是白雪公主吗？或是凯瑟琳·奥兰丝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看看纯洁的女孩是如何摇身变为夜总会的舞女或是开着敞篷车卖弄风情的时髦女郎。❶

危机中的苏坎普



特约撰稿人 杨晓刚 (asukashinjirei@gmail.com)

3月20日,德国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对苏坎普(Suhrkamp)出版社经营纠纷案做出了二审判决,判决认定出版社需从2010年的企业盈余中向投资合伙人汉斯·巴拉赫(Hans Barlach)支付218万欧元分红。这是自去年12月10日柏林地方法院初审判决之后巴拉赫取得的又一次胜利,但对出版社而言却不啻致命的打击,德国媒体对苏坎普的前途一片悲观论调。

要怎样评价苏坎普对德国出版、文学和学术的影响都不为过,苏坎普不仅是出版界重镇,更被视为德国精神生活的标志。在出版社前任社长齐格弗里德·文瑟尔德(Siegfried Unseld)的领导下,苏坎普在支持了一大批德国作者原创作品的出版,为战后的文化复兴克尽厥职。无论是四七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无论是大众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还是学院派学者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曼弗雷

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都将自己的心血交给了苏坎普。要清楚这一点,只需要去任何一家大书店看看可以排成几面墙的苏坎普学术(Suhrkamp Wissenschaft)和苏坎普编纂(edition suhrkamp)书系就能一目了然。然而为了支持文化,苏坎普常年只能维持很低利润率,在缺乏畅销书的不景气年份,甚至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2010年为了降低运营成本还将总部从物价昂贵的法兰克福搬迁到便宜的柏林。正是因此,文瑟尔德去世后,出版社的投资合伙人巴拉赫与文瑟尔德遗孀乌拉·文瑟尔德-伯克维茨(Ulla Unseld-Berkéwicz)发生经营纠纷,以至剑拔弩张,互相都想把对方挤出董事会和管理层。

乌拉继承乃夫遗志,以出版严肃作品为己任,拒绝流行和快餐文化,但缺乏文瑟尔德的经营能力。她领导的文瑟尔德家族基金会占出版社51%的股份。巴拉赫自06年起陆续取得出版社39%的股份,试图挑

战乌拉的领导权，指责她任命的管理层能力低下，在每本书明明有5%-15%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却只赚取3%的利润。2010年他控告乌拉在未与他协商的情况下，以举办文学沙龙为名，用出版社资金租用自己在柏林的私宅，涉嫌侵吞公产，同时起诉出版社没有满足他的投资分红要求。去年12月10日的判决宣布苏坎普败诉，须向巴拉赫支付相关赔偿。

乌拉随即提起上诉，苏坎普案也在德国文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审判决后不久，已逾古稀之年的德国著名作家、曾经的“四七社”成员彼得·汉克（Peter Handke）便卷入出版社的内斗。汉克自1966年起就成为苏坎普的签约作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有该社出版，与文瑟尔德和乌拉私交甚笃，与前者长达数十年的通信也在几个月前刚刚出版。一审宣判乌拉败诉后，汉克可能义愤填膺，在写给德国《时代报》的一篇读者来函中指责巴拉赫“不怀好意，是个彻头彻尾的恶人，妄图独揽出版社大权”。许多德国知名作家也相继表达了自己鲜明的爱憎，1月中旬60多位作家发表公开呼吁，支持乌拉继续执掌苏坎普，并声称“我们属于苏坎普，不属于任何置出版社于险境的个人私业”。苏坎普的签约作家乌维·特坎普（Uwe Tellkamp）甚至扬言更换出版方，以此逼迫巴拉赫撤诉。

不过事实上，乌拉开始领导苏坎普以来，知识界对此并非没有争议，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数位重量级知识分子就因此退出出版社咨议会，多名高层也先后离职。但目睹苏坎普的危机，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知

识分子们也无法无动于衷。1月初，哈贝马斯、亨利希·斯洛特戴克、法兰克福学派现任掌门霍耐特（Axel Honneth）、加拿大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以色列社会学家艾娃·依露兹（Eva Illouz）等为首的160多位欧美学者发表联名公开信，呼吁纠纷双方保持理性，避免出版社事务受到法庭审判影响，以防作为德国批判精神和社会科学的重镇的苏坎普受到损害。前德国文化部长米夏埃尔·瑙曼（Michael Naumann）也应乌拉之邀进行调停。但巴拉赫始终要求乌拉及其领导的家族基金会退出管理层，否则拒绝庭外和解。文瑟尔德家族基金会则在接受《焦点》（Focus）杂志采访时，指责巴拉赫提起的法律诉讼干扰了出版社积累储备金的正常运营，其控股公司不顾出版社财务状况要求多达数百万欧元的股利分红。于是无论德国知识精英们如何呼吁，纠纷双方在利益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在知识界看来，巴拉赫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只关心自己股份的利益最大化，缺乏文化常识，对苏坎普作为德国文化和学术动脉的特殊性毫无体认。但同时，出版社作为自负盈亏的公司，确实不得不面临市场的考验，也必须对自己的股东负责，即便有文以载道的使命，也不能获得市场的豁免，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严肃出版社都得面对的境况。因此，虽然苏坎普提出三点抗辩理由：投资合约中并无明细的利润分红规定；2010年的盈余已经划为2011年的企业资产；出版社目前无论如何无法提取如此巨额的现金。但这三点均未让法庭信服。法兰克福地方法院知道败诉会对苏坎普造成致命

伤害，但乌拉领导的文瑟尔德基金会的确违反了企业合约，法官们不得不根据2009年巴拉赫购入乌拉之子约阿希姆·文瑟尔德（Joachim Unseld）10%股份时获得的投资获益优先权做出判决。

审判宣布后德国文化界上下哗然。媒体在承认苏坎普犯下财务错误的同时，纷纷指责巴拉赫对作为德国精神生活标志的苏坎普缺乏同情与爱护。文瑟尔德基金会声称会再次提出上诉，然而法庭的判决依据让人们怀疑，苏坎普已经在濒临没落的边缘。❶

“东瀛屐痕”之二 ——东京文学地图:上野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如果说东京站是东京的门户的话，那么，上野站则是关东的玄关。从关西方面进京在东京站下车，而上野站则是东北新干线的始发站。东北地区，在日人的意识中，有“老土”的意味。日语的“nobolisan”，原意是进京的人，直译就是“土老冒”，据说最初就是指来自东北地方的进京者。车站大厅中央立有一座圆形金属碑，刻有出身于东北地方岩手县的诗人石川啄木的一首短歌：“好怀念家乡的口音。去停车场的人海中，倾听。”

与红砖洋风的东京站相比，上野站也确实显得过于朴实无华。出了上野站的公园口，过一条小马路，就是著名的上野公园（日本最早的公园，全称为“上野恩赐公园”）。入口处，矗立着一尊西乡隆盛的铜像。以此为中心，方圆两三公里的地界，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发祥地。冈仓天心、夏目漱石、正冈子规、森鸥外、樋口一叶、芥川龙之介、竹久梦二……这些光耀近现代文学史的名字，无一不与这块地界发生过深刻的“粘连”，乃至一个半世纪过去，他们的面影仍清晰可见——在不忍池畔，在温泉旅馆，在寻常巷陌的下宿屋，在阒寂无人的墓地里。

文人骚客云集之地，自然少不了酒肆茶屋。位于池之端广小路的居酒屋“酒悦”，创业于延宝年间（1673年），至今已有340年的历史。昔德川家康为了镇护江户城，在相当于“鬼门”的忍岗（上野公园内的一处山地）上建宽永寺，号称东睿山，作为天台宗的总本山。在宽永寺山下的不忍池畔，建了三间香煎茶屋：分别命名为“酒好”、“酒袋”和“酒悦”。前两家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关张大吉；惟“酒悦”得以延续，至今食客盈门，年中无休。其看板料理福神渍和海苔佃煮，被认为是典型的“江户之味”。明治维新前夕，“酒悦”第十五代店主野田清右卫门为真情回报老主顾，尝试改良茶泡饭中的配菜渍物，以萝卜、莲藕、蜂斗菜、竹笋、黄瓜等七种食材为原料腌制，颇受称许。后被幕末时期作家梅亭金鸢借传统七福神的寓意，命名为福神渍，成了江户名物。

“从动物园前面东照宫（宽永寺的别称）的一个鸟居里横穿过去，就进了精养轩的后门。”早年留学德国的森鸥外在自传体青春小说《青年》中，描写了文青纯一和医学院大学生大村的交游。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向读者普及西洋文明的知识，从西餐中刀叉的摆法到社交场上洋礼的规矩。

上野公园内的著名西餐店精养轩，正是一个文明开化的舞台。明治5年（1872），精养轩始建于筑地，起初业绩平平。4年后，遵从曾巡回考察欧美诸国制度文化的岩仓具视的建议，在能俯看不忍池的上野忍岗建分店，同时兼营酒店业，果然风生水起，成为政、财、文艺三界的顶级社交场，不仅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後藤新平、大隈重信、涩泽荣一等日本未来进路的“设计师”们频频在此餐聚，甚至蒙明治天皇和皇后两陛下的行幸。彼时，日本人刚刚开始吃牛肉、喝牛乳的西化生活，精养轩可以说是日本西餐的滥觞，曾辈出过包括皇室料理人在内的顶尖西餐大厨。森鸥外和夏目漱石均留过欧，是日本的洋派文豪，自然少不了来此饕餮。除了上述鸥外的小说《青年》，精养轩也曾在漱

石的长篇小说《三四郎》中出现。而且，不仅是小说，鸥外的现实私生活也与这家店密切相关。刚从德国学成归国时，热恋中的日耳曼金发女友乘船追来。鸥外唯恐家中知道自己谈了“鬼佬”女友，便金屋藏娇于精养轩。另一位文豪谷崎润一郎早年学业优异，但由于家境贫寒，进学之际，捉襟见肘，困窘不堪。精养轩第三代店主北村重晶富而侠义，惜其文才，伸出援手，谷崎得以寄食北村公馆。然而不承想，多情的文青却爱上了同在北村宅邸中学习礼仪作法的年轻女性，不得不搬了出去。日后，作家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上野，正是这样的地方：它是现实的，却又无往不在文学史中。

一个深秋的午后，空气清冽，天蓝极了。阳光打在金黄色的银杏街树上，然后在



上野公园不忍池畔

柏油路面上泻下一地明暗斑驳，于是整条马路都成了黄金绶带。想到隔海相望的“霾都”，我报复性地大口深呼吸。进上野公园，沿步道溜达，看了两出街头卖艺，一是哑剧，一是杂耍。表演者不仅演技了得，且台风极“正”，表演兼主持，态度不卑不亢，堪称“德艺双馨”，令作为海外观光者的笔者，在每一处各往翻过来的帽筒里丢500日元硬币竟有些羞惭。

上野公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园，是艺青的圣地，除了日本艺术最高学府东京艺术大学外，还有五座美术馆、博物馆、一座图书馆及一座剧场坐落其间。原本打算把几间美术馆“一网打尽”，但时间有限，阳光又

是如此诱人。艺术与自然“交战”的结果，五座美术、博物馆妥协到两座（东京都美术馆和国立西洋美术馆）。日本的美术馆，规模超大，展示内容充实到超乎想象的地步，一座美术馆的特别展和常设展统统看过的话，大半天到一整天不在话下。

迎着日光，一路下山，至不忍池畔。荷花已败，黄灿灿的残叶漂在湖面上，像睡莲，天鹅和不知名的野鸟浮游其间；高中生们绕湖长跑，中年画家在路椅上写生；拾垃圾的流浪汉，把饮料瓶、废报纸和旧杂志分门别类，打包入袋，载到停在路边的小型卡车上。然后走到自动贩售机旁，投币买一罐热咖啡，边抽烟边优哉游哉地读起了当天的《读卖新闻》……这熟稔的风景，竟然与



上野公园里的卖艺者

我二十多年前初见时一模一样，简直分毫不差，时光仿佛停滞了——这也是那个国家最令人不可思议之处：骨子里相当保守，保守到基本拒绝改变，无论好坏。所以，你才会见到延续千年的老店、作坊，还剩7家，延续二百年以上的公司，还有3000多家，而百年老店，则有超过22000家的世界独一无二的“保守主义”传统。

不忍池的东岸，有一条小路，实际上是直通浅草的中央通的岔道。沿此路北上，过了东照宫的鸟居，再往前半里地的样子，便到了池之端三丁目，路边是水月饭店。这是一家著名的温泉旅馆，亦称鸥外庄，旁边立有一石柱，上书“森鸥外旧居迹”。明治23年（1890年），从德国学成归来的森鸥外，终于告别旧日孟浪，与海军中将赤松则良的长女登志子婚后，作为倒插门女婿，住在位于上野花园的赤松宅邸，即今天的鸥外庄。作家在此生活一年有半，直至与登志子离婚，迁居本乡驹込。因在此期间，曾执笔小说《舞姬》，故彼时作家写作的房间，被命名为“舞姬间”，对外开放，游客可在此用餐、泡汤。中庭有树龄逾300年的榎树、逾200年的黑橡树和刻有鸥外笔迹的石碑，屋脊缘廊、雕梁画栋、石板小径，无不透着文明开化之初、明治年代特有的浪漫气息。

过了鸥外庄继续北上，顶头左拐，是东大附近的言问通，再向西直插就到了根津。时值午后四时许，斜阳西挂，霞光万道，一条小街向西无限伸展。道路两边的民居，高低错落有致，白、灰、咖啡色的墙体和屋顶

的琉璃瓦在夕阳下闪烁，店家的暖帘随街树在风中摇曳。街上几乎无人，偶有车辆驶过，但引擎像装了消音器似的，悄然无声，只是偶尔从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乌鸦的叫声，像极了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街景，令人联想到《三丁目的夕阳》中的昭和小镇。过了根津一丁目的交叉点再往前300米，然后折入左手的一条胡同，便到了东大本乡校区的弥生门。弥生门斜对过，有一栋精致绝伦的红砖洋楼，虽然只有三层，相当“袖珍”，却是两间著名美术馆共用的建筑：弥生美术馆和竹久梦二美术馆——均为私立美术馆，由律师鹿野琢见分别于1984年和1990年创设，主要展出鹿野本人终生收藏的高畠华宵和竹久梦二这两位大正时代画家的肉笔画真迹。门票通用，馆内有通道可彼此穿行。一楼大厅的礼品店兼咖啡座“港屋”，承袭了梦二发妻他万喜曾几何时在日本桥所开的精品店的名字。

按说笔者在东瀛各地，泡的美术馆不可谓少，但从未发现一个地方有如竹久梦二美术馆那样的范儿。什么范儿呢？大正范儿，或曰“大正浪漫”范儿——观众中，女性远多于男性；女观众中，着和服者明显多于穿便服者。当我看完展览，走进因狭小而略显拥挤的“港屋”购买礼品时，眼前一片钗光鬓影。一袭袭明艳的吴服，袅袅娜娜，呢喃软语着，纤纤玉手挑选着礼品。细加端详，不由得大吃一惊：瘦脸、苍白、大眼、长睫，面带某种无辜而哀怨的表情，仿佛个个都是从梦二画中走出来的“梦二式”美人！

布拉格访“共产主义博物馆”

撰稿人 邵浴日（上海, taiyuril984@gmail.com）

“坚守真理，至死方休，因真理将令你自由。”

——扬·胡斯

布拉格从来就是一座中欧的历史名城，并且由于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乱破坏，其大部分历史建筑得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此布拉格市内拥有为数众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可谓一座名副其实的“欧洲历史建筑博物馆”。1992年，布拉格的老城中心被整体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那群白鸽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对于国内的年轻一代来说，提起布拉格，很多人的耳边可能都会响起那首传唱一时的《布拉格广场》。的确，这首由周杰伦创作、蔡依林演唱的流行歌曲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大众对于布拉格的美好印象，如今的布拉格也许已经成了中东欧地区最令国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没有之一。

在布拉格游览，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参

观——老城广场（即布拉格广场）、老市政厅、查理桥、瓦茨拉夫广场、布拉格城堡、圣维特大教堂、犹太区……可谓不胜枚举。然而，在徜徉于这些如画的美景之间的时候，笔者不时会冒出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东欧剧变才过去二十多年，如今人们沉浸于自由轻松的生活自是理所当然，但在这个城市里，是不是也有着对过去那段沉重历史的纪念与反思呢？笔者曾撰文介绍过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恐怖屋博物馆”，那么在布拉格，会不会也有着一个类似的历史博物馆呢？

笔者正想借着接下来几天与当地学者会面的机会就此向对方请教，谁知在当晚步行回酒店的路上，便在大街上遭遇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海报。整个海报上只有一个形象，是一只巨大的俄罗斯套娃，她露出两排锋利的尖牙，面目十分狰狞。套娃的旁边，用英文标注了这个形象的含义——“共产主义博物馆”，海报下方还附有具体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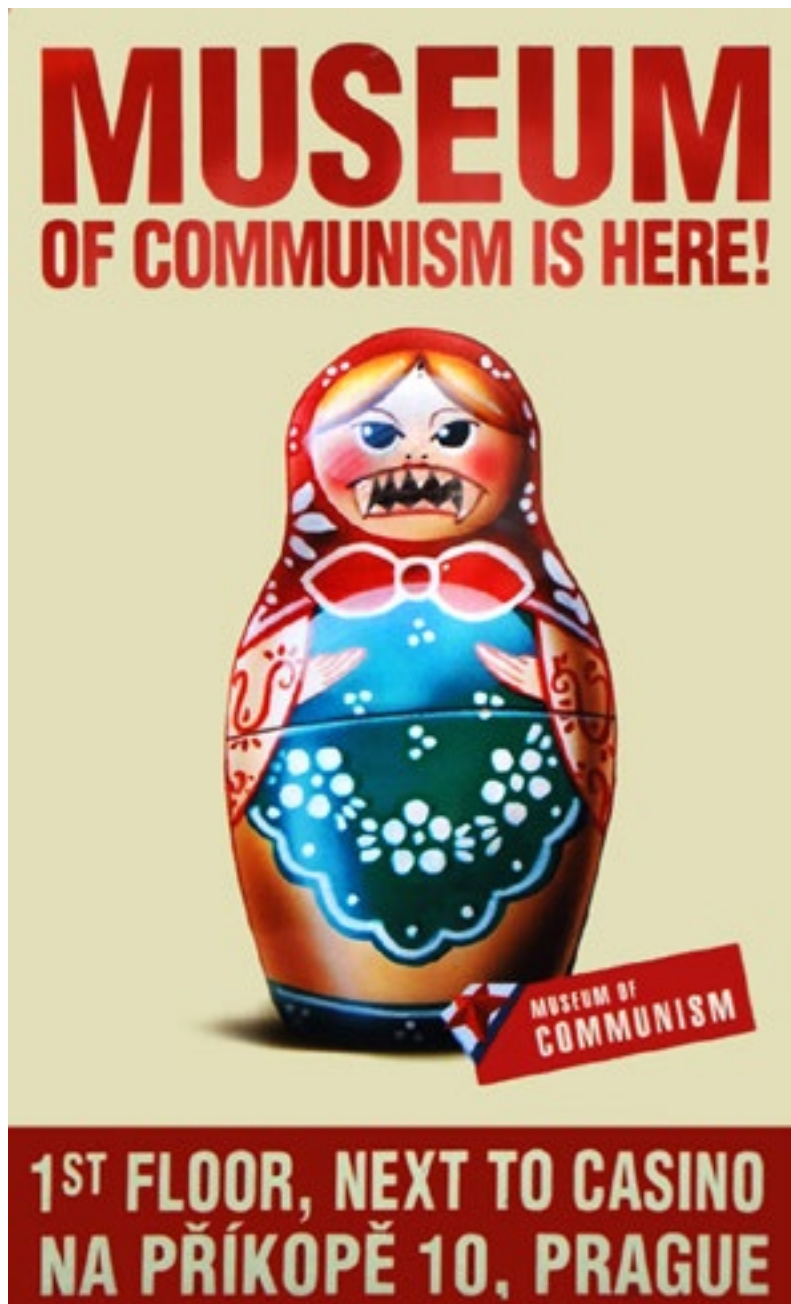
址信息。就是它了！笔者在感叹自己的好运之余，也不禁惊叹于这一创意的精妙——用一只面目狰狞的俄罗斯套娃来作为这座博物馆的标志，非常形象地表明了过去四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主要是由来自东边的外力强加所致。

博物馆坐落于布拉格市中心一幢古建筑的二楼，正如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主要展示的是捷克从二战结束到1989年东欧剧变这段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历史。这期间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又能从博物馆的展览中收获什么？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头说起吧！

联合政府

二战结束，随着苏军对于中东欧各国的“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以下简称捷克）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一开始在东欧各国实行的是所谓“联合政府”的政策，即由该国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联合执政，分享政府的权力。因此在战后的捷克，便是由战时流亡莫斯科的以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为首的捷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捷共）与战时流亡伦敦的以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为首的民主党派组成了“联合政府”。

然而在苏联的主导下，这一“联合政府”的内部势力却是极不平衡的。首先，战后许多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右派政党被政府予以解散，幸存下来的也难以进入政



府，因此很难立足。其次，捷共在联合政府中取得了诸多关键性的部长职位，包括掌控警察系统的内务部和掌控军队系统的国防部。此外，捷共还全面接管了国内的广播电台以及多数的出版印刷机构，从而控制了媒体舆论。

虽然贝奈斯仍然掌握着总统职位，并在名义上享有未经议会允许直接通过法令的巨大权力，但此时的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在权力的运用上却显然要活跃得多。伴

随着战后捷共在国内的强势宣传、对政治对手的强力压制，加之捷克历史上固有的社会民主主义左派传统，捷共迅速成长为国内的第一大党。其在1946年春举行的选举中赢得了40%的选票，哥特瓦尔德也进而成为捷克的总理。

1947年，美国为了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二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并同时抗衡苏联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扩张而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这一援助计划的目标国不仅包括西欧各国，也包括了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各国，乃至苏联本身。但斯大林认为该计划的签署会严重威胁到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因此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并命令那些“人民民主国家”也照此办理。但此时的捷克政府、包括那些共产党部长们，都支持本国参与马歇尔计划，并接受了美国发出的参加巴黎协商会议的邀请。斯大林马上对此作出了激烈抗议，并迅速将哥特瓦尔德召到莫斯科予以严厉训斥。于是，捷克政府又不得不收回了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从而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失之交臂。至此，捷克的最终话语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已经不言自明了。

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斯大林于1947年主导成立了由9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共产党情报局”，其目的在于通过各国共产党之间对情报信息的交换，建立国际性的共产党统一战线，并最终加强苏联对各社会主义卫星国的控制。在其成立大会上，苏联人再次对捷克参与马歇尔计

划的企图予以了谴责，并指出捷克是当时社会主义集团中唯一一个尚未巩固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此举促使哥特瓦尔德在国内采取了进一步的强硬措施，并于1948年最终演变为共产党全面夺权的“二月政变”事件。

二月政变

1948年2月20日，为了抗议捷共对于警察系统的全面掌控，联合政府中的12名民主党派部长一同向总统贝奈斯提交了辞呈。他们原本期望贝奈斯会拒绝批准他们的辞呈，并通过此举使得捷共方面认识到自己的政策不受欢迎，从而迫使对方的政府部长们辞职。但令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捷共立刻对此采取了全面的反制行动。他们发动工人和民兵上街举行游行示威，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而时任国防部长的斯沃博达（Svoboda）也明确表示了他对哥特瓦尔德的支持，不用说，他也是一名共产党人。2月24日，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发起了全国性的总罢工，总计有250万工人参与了这次罢工行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贝奈斯以及布拉格的市民们所看到的这些支持共产党的群众示威，其实并非真实民意的显示。或者说，在当时捷共已经全面掌控了武装力量、以及多数媒体机构的情况下，所谓的“民意”是很容易被当权者任意操控的。正如一名捷共的基层官员在事后所回忆道的：“因为布拉格市内所有通往瓦茨拉夫广场的街

道都被严密封锁起来了，除非你是共产党组织的工人队伍，否则谁也别想进入广场。捷共还对广场本身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广场周围所有建筑的窗户和阳台都已经提前被工人和民兵占据了。布拉格的所有桥梁也被民兵全部控制了。在哥特瓦尔德发表完讲话之后，捷克共产党立马组织了民兵部队在布拉格市中心的游行示威……”

事实上，正是在此期间，捷共建立起了所谓的“人民民兵”组织，这支部队主要由工人组成，而这些工人早在之前的一个月就已经被建立者给秘密武装起来了。它的职责起初主要是对国内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恐吓威胁，后来便进而成了捷共镇压一切国内示威游行的暴力机器。当然，在共产党的宣传口径中，这支部队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铁拳”。由此我们看到，也许正是这12名部长的辞职，为捷共提供了发动一场政变行动的契机。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为了消弭爆发内战的危险，年迈体弱的贝奈斯总统屈服了，他于2月25日接受了民主党派部长们的辞呈。这样一来，哥特瓦尔德便得以顺势将自己的心腹填补进空出来的那些部长席位了。至此，捷克政府已完全处于共产党的掌控之下，捷共也由此完成了从“联合政府”到一党专政的“华丽转身”。这便是捷克当代史上著名的“二月政变”。

应当承认，捷共在战后初期的执政还是拥有一定民意基础的。这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捷共是战时与纳粹占领政权没有

任何瓜葛、并坚持抵抗的少数政党之一；而二战初期盟国与希特勒签订的伤害了捷克利益的《慕尼黑条约》，又使很多捷克人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失望和怀疑；同时，捷克还具有非常深厚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许多人都对社会主义和苏联抱有好感和幻想。这些都是捷共在1946年的大选中能够获得40%选票的原因。但是，即使是这些将选票投给共产党的人们，恐怕也没有想到，捷共上台，会意味着自己从此将丧失进行重新选择的权利。而这样的状况竟要持续四十年之久，就更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的了。

经济改造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捷共也对国内的工业企业实行了国有化改造。截至1948年4月，捷克国内凡是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都已经被政府没收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国家计划部门得以通过一个个“五年计划”来主导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斯大林的战略格局中，捷克被设定为整个东欧集团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因此，从40年代末期开始，捷克大多数的投资都进入了钢铁、工程机械以及军工企业，轻工业的发展则停滞不前。于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当西欧各国在战后大力发展其消费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时候，捷克的工业部门却仍在不知疲倦地生产着钢铁和坦克……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曾经跻身世界前十大工业国的捷克，

开始逐渐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捷克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也毫无悬念。捷共在国内推行了仿效苏联模式的集体农庄政策。农村里原来的大农场被直接改造成了“国有农场”，而小农们也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强迫放弃自己的土地，成为集体农庄里的工人。集体农庄的产出由政府统一收购和分配，而政府拿走的份额则是一年高过一年，这使得很多农民拒绝与政府签署农产品的分配合约。官员们对这些拒不合作的农民则是毫不手软，往往以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作为惩罚，有的农民甚至会面临牢狱之灾。

当然，这一过程也激起了部分农民的激烈反抗。1951年7月2日，捷克东部一个叫巴比采（Babice）的小镇上，捷共的地方官员正聚在一起开会，突然窗外枪声大作，一梭梭子弹穿过窗户打进房间里来，三个捷共官员当场毙命。该事件立刻被捷共当局宣传为国内反共势力的武装起义，并迅速实行了报复与镇压——所谓的“嫌犯”被立刻予以审判，其中7人被判处极刑。捷共还利用这一事件，在打击国内反动势力和破坏分子的幌子下，进一步对那些不合作的农民予以镇压和迫害，从而更加强化了农业集体化体制。

事实上，当局这种将“坏事”转化为“好事”的成功案例在共产党执政时期可谓层出不穷。譬如在捷克的某个地区，苏联顾问曾大力建议进行水稻种植，但结果却

是产量少得可怜，因为捷克的气候和土地条件根本不适合种植水稻。然而，低产的原因却被官方归结为帝国主义的蓄意破坏。该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也被指控为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并最终被判入狱。再比如，因为受到一种叫做“科罗拉多甲虫”的侵害，捷克1950年的土豆产量急剧下滑。而捷共官方却随即给了这种虫子一个响亮的外号——“美国甲虫”，并进而宣称是美国间谍故意将这种虫子带入了捷克境内，以毁坏土豆作物，让人们挨饿。

由此我们看到，在一切信息渠道都被垄断的情况下，其实无论发生什么，都将有利于巩固当局的统治——如果作物歉收，那就是因为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因此需要进一步巩固党的统治，才能打击反动势力，取得丰收；而如果一旦取得了丰收，那就更是党和政府的功劳了，因此就更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以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已然丧失了起码的纠错机制，等待它的，便只能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政治审判

“二月政变”之后，随着贝奈斯总统拒绝签署新政府所制定的“人民民主宪法”，并进而辞职，格特瓦尔德终于在该年6月登上了总统宝座。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针对异己的政治审判。在这些审判当中，捷共的秘密警察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主要

负责对“嫌犯”进行搜证、逮捕、审讯以及逼供。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功劳就是发掘出新的“颠覆”证据。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秘密警察甚至会主动“发起”和“组织”秘密的反抗团体。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则可以十分便利地搜集到相关人员的“黑材料”，并作为之后对他们实行逮捕、审判和监禁的证据。

捷克的政治清洗以1948-1954年这段时期最为严酷，此间共有10万人左右被冠以政治罪名予以起诉，其中超过一半被判处了10年以上的监禁。很多广受尊敬的社会名流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说来有点奇怪，刚刚经历过德国纳粹统治的捷克人民，对于捷共所实行的这套政治清洗，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当年的纳粹就是这么对付那些不合作分子的。在很多人眼中，就连双方的权力架构都显得那样的相似——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一个最高领袖手里，在纳粹德国是希特勒，在苏联则是斯大林。打着极左意识形态旗号的共产党，似乎与极右的纳粹党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如果说这个政党与纳粹还有着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还将清洗的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同志——在党外的政治对手被消灭得差不多之后，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几乎无一例外地开启了党内的权力斗争和清洗运动。于是，很多当年参与清洗别人的党员骨干，如今又落到了其他负责“清洗”的“同志们”手中！

在众多的党内清洗案件中，最具代表

性和戏剧性的是对于捷共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的审判。1951年7月，捷共还为这位总书记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庆祝活动，以祝贺其50岁生日，国内的媒体上也充斥着对他的颂扬与吹捧。但仅仅两个月后，斯兰斯基就被时任党主席的哥特瓦尔德指控为犯有重大错误而被革职。11月，在参加完一个晚宴回家的路上，他就被逮捕了。

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与帮助下，国家安全局指控其正在组织另一个权力中心，而这个小组正在筹划颠覆新政权的阴谋。与此同时，国安局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抓捕行动，将与斯兰斯基有着密切往来的党内高层一网打尽。最后，斯兰斯基被以托洛茨基分子、铁托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等罪名处死，一起被执行死刑的，还有他的另外10名党内同僚，此外还有三人被判终身监禁。尤为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党国高层人士的骨灰竟被当局撒到一条结冰的乡间马路上，用以增加路面的摩擦。

哥特瓦尔德之所以要不断地实施恐怖清洗行动，除了对权力的贪婪之外，其实也出于自己内心的恐惧。1948年的时候，捷共党内的公报上曾经刊发了一篇由学者科尔曼（Kollman）撰写的文章，其中批评捷共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太过温和，让人丝毫看不出实行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哥特瓦尔德知道科尔曼在苏联的核心决策层拥有一位重量级的朋友，因此便将这篇批评文章当作了自己倒台的一个预兆。不久，当

他忐忑不安地去莫斯科参加东欧各国领导人会议的时候，他曾紧张万分地向斯大林当面表达了这一顾虑。这才发现，原来斯大林根本就不知道这篇文章。斯大林一边笑着安慰哥特瓦尔德，一边当场将科尔曼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就这样，科尔曼取代了哥特瓦尔德，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名阶下囚。也许这时的哥特瓦尔德才意识到，在这个制度下，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然而，对于这个制度的创立者和守护者——他自己来说，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唯一能做的，便是尽力清洗别人，保住自己。

文化管制

捷共掌权之后，对艺术、文化、教育和体育等领域都进行了全面的管制。在艺术方面，以往的诸多艺术形式都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成为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艺术形式。在布拉格，这一风格的最佳代表是一座斯大林雕像。而关于这座雕像的那段故事也颇具戏剧性。

二战之后，捷共一直打算在布拉格为社会主义集团的领袖斯大林建一座雕像，以纪念他的不朽。该提议早在1945年就被提出来了，但究竟应该选址在哪里，才能充分体现苏联的伟大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却一直存在争执。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已于1948年为斯大林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以庆祝其70大寿。其他一些市镇也早已为斯大林雕像举行了奠基仪式。而布拉

格却仍在寻找一处合适的地点。

最终捷共当局将地址选定在了俯瞰布拉格全城的莱特纳（Letná）山顶。但在如此开阔的这么一个公共空间树立一位伟人雕像，它就必须具有一定的体量才行。因此，负责这一工程的委员会最后敲定了它的高度——30米！该雕塑由粉红色花岗岩雕刻而成，而在雕塑的附近，则从外地移植来了数千颗成年树木。整个工程耗费了五年时间，斯大林并没能活着看到它的揭幕，而同样没能等到那一天的还有该雕塑的创作者——雕塑家奥塔卡尔·施威茨（Otakar Švec），他在自己的这件作品完工前夕自杀身亡了。

这座雕塑最终于1955年5月1日正式揭幕。然而，还没到一年的时间，苏共就于1956年2月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新一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罪行予以了全面的揭露。

忽然之间，布拉格这座刚刚树立起来的巨型斯大林雕像就陷入了一个十分地尴尬的境地——如果让它仍然耸立在那里吧，就好像布拉格时刻笼罩在一个恶魔的阴影之下，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如果把它拆了吧，就更说不过去了，它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揭幕也才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再把它拆掉，劳民伤财不说，对捷共的统治威信也将造成巨大的冲击。

就这样，捷共高层整整纠结了7个年头，才终于在1962年决定将其拆除。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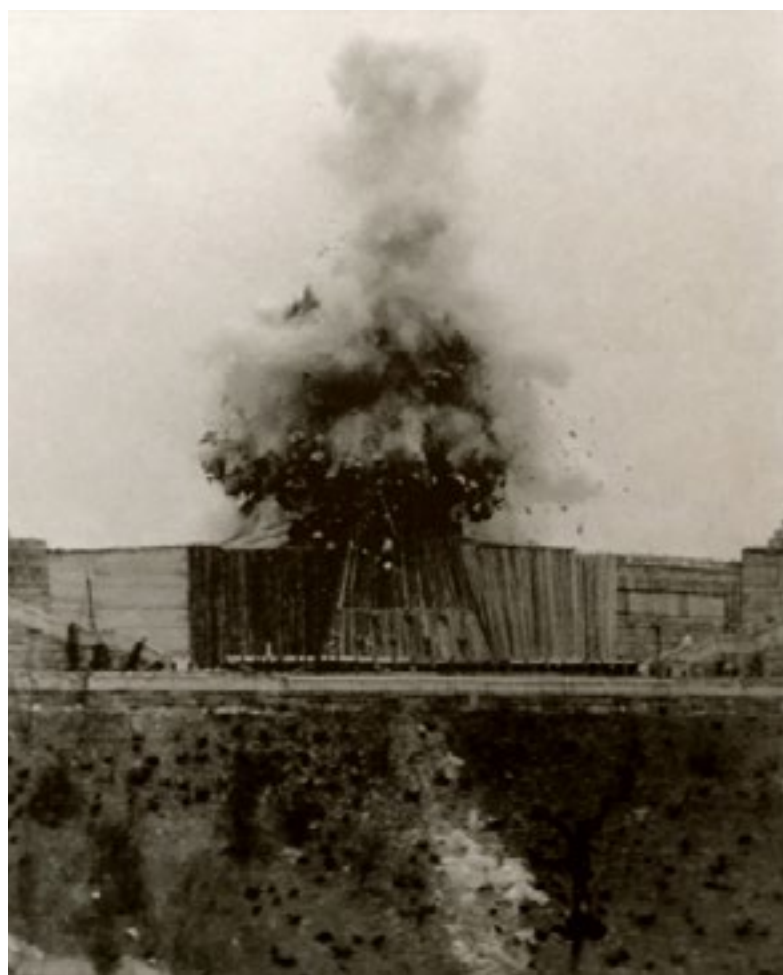
就跟当初建立这个雕像一样，如今对它的拆除，也是一个艰巨而昂贵的工程。而且以它的体量，拆下来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因为显然放到哪里都不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因此当局最终确定的方案也十分干脆——对之实行定向爆破！最后，在爆破专家们的努力以及数吨炸药的帮助下，这座雕像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在这座“共产主义博物馆”的一个房间里，展示着那座巨型雕像的照片——游人站在它的脚下，显得如此渺小；而在另一个房间，一张照片则捕捉了当时炸药引爆的一瞬间——轰然一声巨响，碎石飞溅，雕像从此灰飞烟灭。我想，任何人只要看过这两张

照片，都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并在这一鲜明的对比中体会到历史的吊诡与荒诞。

在文化方面，“二月政变”之后不久，所有不遵循捷共指定文艺路线的文艺工作者都被禁声了。他们原先使用的出版社和印刷厂要么被当局予以废除，要么就被收归国有。教育部还制定颁布了一个禁书书目——根据这份书目，多达2千7百万本书从图书馆和学校里被“清除”了出去，其中不少都被彻底地损坏、甚至直接销毁掉了。

为了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捷共也参照苏联模式对整个教育系统进行了全面地改造。因此从很小开始，捷克的孩子就被灌输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并被培养起对富人阶层的仇恨以及对共产主义事业及其领袖斯大林的热爱。为了树立起苏联



在捷克人心中的地位，捷共的官方教材将大多数科学技术的发明都归功于俄国人。比如在一本苏联官方出版的百科全书里，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19世纪末，一个乌拉尔的俄国农民正在试驾他亲手制作的一辆汽车……

改革前奏

前面提到，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在东欧国家集团内引发了以“波匈事件”为代表的第一波改革浪潮。虽然两国的改革计划都因为苏联的干涉而未能实施，匈牙利的街头起义更是受到了苏军坦克地残酷镇压，但毕竟两国原先的保守派领导人最终都被相对温和的改革派人士所取代。然而，邻国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当时的捷克并没有多少影响。

哥特瓦尔德于1953年去世之后，接替他担任捷共第一书记的是同为保守派的安东尼·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随着他于1957年兼任总统职务，诺沃提尼成为捷克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统治下，捷克国内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因为他没有继续哥特瓦尔德的政治恐怖政策，而是转而采取了更为“柔性”的方式，比如通过无所不在的监视和窃听系统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然而，诺沃提尼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已经不是政治对手的挑战，而是经济的滑坡。捷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60年，原计划五年内实现经济增长42%，工业

产值增长56%。但仅仅两年之后，就已经执行不下去了。事实上，从1961年开始，捷克的经济增速就开始出现了下滑，到了1962年，经济甚至开始出现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日本倒恰恰实现了捷克设定的那个增长目标。这一情形令捷共当局非常难堪，因为根据共产主义的理论，经济危机只会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在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捷克，经济只会保持持续增长。但现在，事实显然反了过来。

当时的每个捷克人都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这种经济衰退，尽管政府将数十亿克朗（捷克货币单位）投入了巨型工厂的建设，但商店里却始终缺乏基本日用品供应。而布拉格的老城区也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无可挽回的经济窘境——因为缺乏资金来对那些历史建筑进行维修和保护，整个老城区正变得日益衰败破旧起来。1965年3月18日，临近瓦茨拉夫广场的沃迪奇科瓦大街（Vodičkova）上的一幢老建筑的窗台竟因为年久失修直接脱落掉了下来，砸死了一位行人。从此，布拉格市区的建筑外墙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诸多的木制脚手架，以防止类似意外的发生。但是你可以想象，在这些高高矮矮、临时搭建起来的脚手架的映衬下，这个曾经美丽如画的观光城市，如今成了一副什么模样！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给诺沃提尼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不得不将一些极端保守派分子逐出核心

权力圈。由此，年轻一代的捷共官员得以进入到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他们于196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对经济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

到了1967年的时候，诺沃提尼已经失去了党内多数同僚的支持。是年10月，布拉格的学生们举行了自发的示威抗议，结果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这使得社会上对于诺沃提尼的不满达到新的高潮。捷共当局于是邀请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前来解决争端。当勃烈日涅夫看到捷共党内的相互攻击和争执不休而厌恶地抛出那句“这是你们的问题”之后，改革派们便立即将之当作了苏联对捷克实行自己独立政策的默许。由此，捷克的改革将翻开新的篇章——“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捷共中央委员会免去了诺沃提尼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接任。这位时年46岁、来自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将成为改革希望的一个象征。

不过一开始，人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变化，虽然官方报纸的社论仍在老调重弹着所谓“深化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谁都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渐渐地，人们开始感到新闻媒体正在以一种比以往更为宽松自由的方式进行相关的报道。不只那些文学杂志，就连官方报纸也同样在强调改革

的迫切性，并开始报导诺沃提尼时期的官员腐败案件以及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捷克国内的出版审查制度在1月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已经被废除了。

当时的捷共拥有170万名党员，超过全国人口的10%。但那是因为自1948年以后，入党就成了获得任何体面职位的必要条件，所以很多人并非因为自己想成为一名党员，而是为了生计和前途才被迫入党的。很多党员对自己在过往的政治恐怖中保持沉默感到十分愧疚，希望能多少做出一些补偿。这些人如今都成了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3月底到4月初，捷克的最高决策层发生了进一步的人事变动。二战英雄路德维希·斯沃博达（Ludvík Svoboda）取代诺沃提尼担任了总统职务。他接着任命了一个由总理欧德里希·切尔尼克（Oldřich Černík）领衔的新内阁。而广受民众爱戴的约瑟夫·斯姆鲁科夫斯基（Josef Smrkovský）则担任了国民议会的议长。至此，捷克的主要党政要职都已被改革派人士所占据。

捷共中央委员会紧接着就通过了一份“行动纲领”，其中包含了主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这份文件提出要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领域，承诺要打破共产党对于权力的垄断、承认社会利益和观点的多样性、并计划赋予民众在不同的领导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在经济领域则要进一步引进市场机制，放松政

府对于经济主体的管控。

在布拉格之春开头的这几个月里，数百份请愿书被送进捷共中央委员会，一致要求迅速召开捷共非常代表大会，这样就可以通过重新选举中央委员，把诺沃提尼的残余势力给清除出党的最高机构。杜布切克将大会的日期确定在9月6日。于是，国内立刻掀起了新一轮支持改革派的“拉票”运动。谁都看得出来，改革派将在这次大会中大获全胜。

但是即将到来的这次大会也在很多党员干部的心中引起了担忧。因为他们知道，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他们很有可能会丢掉中央委员的职务。因此，这群在年初支持将诺沃提尼赶下台的官僚们，现在则逐渐转向了改革的对立面。

6月27日，捷克国内的主要报刊同时刊发了由作家路德维克·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所起草的《两千字宣言》。该宣言着重强调了将改革继续深化的必要性，并呼吁民众通过监督而非暴力反抗政府当局的方式来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该宣言的发表激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并得到了国内知识界和公共领域诸多知名人士的签名支持。

捷克国内的改革尝试本就在苏联及东欧邻国的领导人心中引发了怀疑与恐惧，随着形势的发展，波兰、东德等国的领导人更是联合苏联对杜布切克提出了公开的警告，希望其能停止改革的步伐，加强共产党的统治。此时的杜布切克面临着两难选择——

如果屈从于苏联的要求，他将面临失去民众支持的风险，而且在改革潮流已经变得势不可挡的形势下，猛踩刹车很可能会引发不可测的社会动荡；但他又不可能无止境地推动国内的变革，毕竟他仍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改革的初衷也只是建立一个“具有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更何况，苏联的军事威胁也是他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7月29日，苏联与捷克在两国边界的切尔纳小镇举行了会谈，会上勃烈日涅夫对杜布切克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其撤换部分改革派领导人、恢复新闻审查制度并禁止所有的“反革命”组织。会后勃烈日涅夫陪同杜布切克一同前往布拉迪斯拉发举行进一步的磋商，总体局势似乎已经有所缓和。然而，这只是暴风雨前夕的片刻宁静而已。

苏军入侵

1968年8月21日清晨，很多捷克人都是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或是敲门声给惊醒的，他们听到的也几乎是同样一句话：“快醒醒！布拉格被苏联人给占领了！”就在20日午夜，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国家，动用了30万士兵、6000辆坦克，对捷克发动了突然袭击。6个小时之后，苏军就已经控制了捷克全境。东德、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军队也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所以当西波希米亚的居民们突然见到一群说着德语的士兵将坦克开进他们城镇的时候，他

们简直难以置信——难道法西斯一夜之间又回来了?!

因为捷克当局事先完全没有料到苏联会发起这次入侵,所以其军队部署的假想敌还仍然是西德,谁知道,敌人这次却来自东边。当时捷克境内的多数弹药库也都大门紧锁,人们根本无法获得用来抵抗的武器装备。当然,在布拉格市区还是发生了零星的战斗,而且就连反抗者们选择的据点,都和当年反抗纳粹德国入侵时的一模一样!许多城镇的门牌路牌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当地人自发将它们摘了下来,给侵略者造成了诸多不便。同时,民间还掀起了以不合作的方式来抵制侵略者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给侵略者留一滴水!”

在莫洛托夫鸡尾酒(自制燃烧瓶)无法抵挡住苏联坦克的情况下,捷克人干脆走上街头,直接与侵略者面对面。自从捷克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后,俄语也成了学校的必修科目之一。现在,俄语终于派上了用场。在布拉格街头到处会看到这样的景象——那些二十岁出头的西伯利亚男孩们正一脸茫然地从坦克里探出头来张望。在出发之前,他们被告知一群反革命分子正在捷克进行破坏颠覆活动,但如今他们面对的只是一群操着流利俄语的中年女士在冲着他们大喊“侵略者”!还有人走上前和他们攀谈起来,向他们解释民主的含义,以及什么是“带有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

当第一架苏军运输机开始在布拉格上

空盘旋的时候,捷共的中央委员会正在开会,于是他们立即起草了一个抗议决议,谴责苏军的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但同时并没有呼吁人们拿起武器进行抗争。清晨的时候,苏联的官员们闯进了捷共的党部大厦,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在克格勃特工的枪口下被押进了一架苏联飞机——捷共党的第一书记、政府总理以及其他党政高官就这样被绑架到莫斯科去了!

而就在苏军入侵的第二天——8月22日,布拉格郊外一家大型机械企业“切卡德”的厂区内,秘密召开了捷共第14次非常代表大会。即使冒着被苏军发现的危险,

“切卡德”的工人和布拉格的市民们仍然将全国选出的1543名代表中的大多数秘密护送到了目的地,最后有1192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对苏军的入侵以及非法囚禁杜布切克等人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并选举被关押的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这无疑是国际共运史上最为奇特的一幕——在一个号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共产党人却要像地下党一样秘密地召开代表大会!

被劫持到莫斯科谈判的杜布切克等人非常担心捷克也会像1956年的匈牙利一样遭遇大规模的审判和处决。但由于愿意与苏方合作的捷克人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苏联根本无法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于是,苏方向杜布切克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他被允许回到布拉格,其基本的改革框架也

可以保留，而代价是必须解除部分改革派领导人的职务，并允许苏军在捷克境内长期驻扎。最终，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领导人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于8月26日签署了所谓的“莫斯科条约”，在法律上接受了苏军对于捷克的这次占领行动。

8月21日这一天，苏联人可以说是成功了，因为他们在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伤亡代价的情况下就迅速占领了捷克领土，并成功迫使捷克当局就范；但同样是在这一天，苏联人又彻底地失败了，因为这次入侵，使得整整一代捷克人放弃了对于苏联及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从此之后，一旦苏联的武力控制有所放松，他们就会彻底地投向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怀抱了。

“正常化”

“莫斯科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杜布切克就被允许回到了布拉格。捷克从此被迫进入了所谓的“正常化”时期——取消已有的改革措施，重回之前的苏联体制。虽然杜布切克和他的一些同僚仍然保留着原来的职位，但苏联人显然只是在利用他们来实现某种“过渡”。而以斯洛伐克人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们，也早已跃跃欲试了。

在这个“过渡期”，捷克国内也并非死水一潭。1969年1月16日，查理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扬·帕拉赫(Jan Palach)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的国家博物馆前将一桶汽油浇在了自己

身上，点燃自己后开始在广场上奔跑，以这种决绝的方式表达了对苏军入侵的抗议。

当路人上前扑灭他身上的火后，他还活着。人们在他的包里找到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因为我们整个民族都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所以我决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抗议，并唤醒这个国家的人民……”他还向同龄人呼吁——不必步他的后尘，要坚持活下去，并且抗争到底！三天之后，他才去世。在他的去世公告上，帕拉赫的父母引用了中世纪宗教改革家扬·胡斯的那句名言——“坚守真理，至死方休，因真理将令你自由”。布拉格市民随后自发组织了他的葬礼。葬礼当天，共有80万市民走上街头，默默地表达着对这位青年的哀思，因为帕拉赫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难以承受的道德危机，他们每个人也同样感同身受。

帕拉赫的自焚引发了国内学生的新一轮抗议，不少人选择了绝食的方式。2月25日，时年19岁的高中生扬·扎伊茨(Jan Zajíc)再次在广场附近的一条街道里点燃了自己，并当场死亡。其他几个市镇也接连发生了数起类似的自焚抗议。如今，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的一处小花圃里，人们可以找到那两位青年的纪念碑，上面时常躺着一束束鲜花。

这些决绝的事件触动着每个人的心灵，并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苏联方面及其捷克合作者们也感到十分被动。因此在公开场合，他们极力表达着对这些年轻生命的惋惜。但与此同时，那些亲莫斯科的媒体却

接到命令，要求散播出这些自焚事件背后的“阴谋”——于是这些媒体宣称，是一些反共组织鼓动了这些孩子的自焚，以此来达到反共的宣传目的……

1969年4月，莫斯科让胡萨克取代了杜布切克，成为捷共第一书记。这之后，“正常化”过程开始加速。胡萨克逐步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并将矛头指向了所有改革派人士。至此，布拉格之春已彻底终结。

在“正常化”初期，捷克躲过了当年匈牙利的命运，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审判和处决。胡萨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轻松”得多的选择——签署一份公开申明，表明你同意

“苏军的进入”，并对自己在1968年的反革命宣传中受到蛊惑而表示道歉。只要这样做的人，就会被保留党籍，并继续留任。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数千人拒绝了这桩“出卖灵魂的交易”，并因此丧失了之前的社会身份。他们被当局发配到底层的工作岗位，并被标上“反革命”的标签，其子女也将在整个体制中遭受歧视和不公的待遇。因此，我们在对他们的举动表示敬佩之余，并无法简单地对那些签署了申明的人予以道德上的谴责。事实上，是这个体制，将整个民族拉进了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

如果说，很多捷克人在1968年之前加入共产党还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的目标、或是相信共产党本身能够进行自我改革的话，如今人们入党就纯粹只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了。即便是党内高层，对于原先那套意识形态也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更为现实的权力分配。

剧变后的第一任民选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曾经举过一个蔬菜摊的例子来说明“正常化”时期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淡漠。那些摊主们一年中会有好几次拿出那些共产主义的标语来装饰他们的摊位。于是在那些洋葱和胡萝卜的旁边，人们常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哈维尔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真的相信这



些宣传才这样做的。多数店主甚至从不理会标语上究竟写的什么。他们只知道当局希望他们这么做，他们就照着做了。而那些经过这些摊位的人也不会阅读这些标语，甚至当局的官员们也同样不期待人们会对这些标语做出什么反应，似乎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共识——那只是一个必要的仪式，表明捷共仍在统治这个国家罢了。

在这种道德冷漠、功利主义盛行的环境下，胡萨克像他的前辈诺沃提尼一样，选择通过无所不在的监视和窃听来巩固他的政权。当局还为每个国民设立了一份“档案记录”，里面的内容本人却无法看到。这样，任何人只要对当局发表了什么看法，都有可能因为别人的告发而被记录到档案中去，从而对他的前途产生影响。这成为一项十分有效的控制手段——人们为了避免受到不良记录的影响，就必须（至少在表面上）完全遵照官方所设定的行为准则。而那些负责记录档案的官员们，哪怕官阶再小，也足以主宰他人的命运。

当然，胡萨克的统治不仅有政治压迫的“大棒”，也有经济福利的“胡萝卜”。胡萨克十分清楚，诺沃提尼时代之所以会引发那么多的社会不满，除了政治上的专制之外，还因为经济上的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胡萨克试图以经济上的消费主义来转移人们对于政治的关心，以各种形式的经济福利来尽量平息人们对于缺乏政治权利的不满——反正政治改革是不会被允许的，你们不如停止对政府**

的批评，转而去享用廉价的“土豆烧牛肉”（goulash）吧！

“七七宪章”

当人们屈从于70年代的“灰暗”现实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或许也在期待着一个契机，来打破那个可怕的沉寂？1977年1月，西欧国家的数份重要报纸同时刊登了由捷克国内数百名异议人士共同签署的一份公开声明——“七七宪章”。该声明要求捷克政府履行其于1976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条约》，给予政治反对派以发表言论的权利，并遵守其中相关的人权保护条款。

《赫尔辛基条约》是在当时美苏缓和的背景下签订的，西方国家允诺为苏联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作为回报，苏方也答应接受西方的人权观察。当然，当时签署这一协定的共产党官员认为那只是个形式，并没想过真的要去实行它。但是现在，“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们却在公开对他们呼吁——你们签订的是一个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条约，你们有义务履行它！

捷共当局立即对此进行了回应。党报在1月12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将之指责为帝国主义集团的阴谋，并将那些签署者称为“雇佣兵”。官方媒体还想方设法地对签署人的信誉和身世进行攻击，比如他们就散布消息说，哈维尔的父亲曾是个纳粹合作者。同时，当局还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将签署者中的代表人物关了起来。捷共

的回答已经再清楚不过——《赫尔辛基条约》只是一张废纸罢了。

胡萨克知道这些签署者具有很强的社会号召力和媒体影响力，如果普通民众知道了这篇宣言的内容，以及它的签署人有哪些的话，一定会对他的专制统治构成冲击。因此警察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极力阻止人们读到这篇宣言。所以有趣的是，尽管那段时期的报纸和媒体对“七七宪章”进行着轮番的批判和攻击，但宪章的原文却从没在国内的媒体上出现过一次！此外，政府还进一步组织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来共同发起对于“七七宪章”的抵制。胡萨克的这些措施在当时可谓十分奏效，在那些乡村地区则尤其如此——在一方面看不到宪章原文、一方面又见到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反对宪章的情况下，很多人都真诚地相信，那个叫做“七七宪章”的玩意儿，一定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但也正因为当局如此严酷的打压，反而将不少捷克国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尽管该宪章的初始签署者只有几百人，但随后又有上千位知名人士加入了进来，他们代表着占捷克人口10%的，那群公开表示不认同这个政权的人，而他们身后，显然还有着更大规模的“沉默的大多数”。

八十年代

进入80年代，苏联及东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老人政治”的状态，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都被那些七八十岁的老

人们占据着，他们拒绝一切变革，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毫无兴趣，只是惯性地维持着原有的体制。在这种状况下，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显得一片死气沉沉，而经济发展也因为体制的僵化而陷入持续的停滞或衰退。

但这次“老人政治”的打破却是首先从苏联开始的。随着苏联老一代领导人的相继去世，年轻一代的戈尔巴乔夫终于在1985年3月成为了新一任的苏共总书记。面对国内不断衰退的经济形势以及由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明白，只有实行改革，才可能改变如此被动的状况。因此戈氏全面开启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并同时伴随着“公开性”的实施——逐步放开对媒体的管制。

戈尔巴乔夫在掌权之后，还逐步放松了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因此，他在国内所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也没有强加到这些东欧国家身上。只不过这次是苏联老大哥的改革走在前头了。这使得胡萨克等人感到十分被动。你可以想象，虽然他们仍然掌控着国内的媒体，但却无法对苏联的出版物实行审查。因此当捷克的民众拿着苏联出版的报纸，读到莫斯科所实行的那些令人震惊的政治改革的时候，捷共的领导人们会有多么尴尬！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下，捷克国内的反对派运动也开始有所发展，除了之前的“七七宪章”运动，还出现了各种环保组织以及和平运动团体。人们开始重

新对政治感兴趣了，并关注起各种公共话题来。1989年6月，反对派领袖发起了名为“几句实话”的请愿行动。几个月内签名者的数量就超过了4万。其中有很多艺术家、作家和社会名流，他们将这次签名当作对自己之前反对“七七宪章”的补偿。尽管当局对他们发出了各种警告，比如威胁要取消他们的演出权利等等，但他们却再也不吃这一套了。

1988年8月21日，是苏军入侵捷克20周年的纪念日。不出所料，瓦茨拉夫广场上再次出现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同样不出所料，示威者受到了军警的武力镇压。到了1989年1月，又有数千人走上街头纪念20年前帕拉赫的自焚抗议，军警自然又再一次出动。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那段时期的典型标志似乎就是塑料盾牌组成的军警人墙、高压水枪以及催泪瓦斯……

这个时期，东欧各国的政治形势可谓风起云涌。1989年4月初，波兰完成了圆桌会议谈判，共产党当局与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达成了举行半自由的议会选举的协议；9月，匈牙利完成圆桌会议谈判，确定于次年初举行全国议会自由选举。同期匈牙利开放了其与奥地利的边境，于是立刻有数万东德人涌入匈牙利，再经由奥地利抵达西德。11月9日，东德当局被迫开放柏林墙，随后无数东德居民涌入西柏林，柏林墙也被民众自发拆毁。这一切，也都在预示着捷克的最终变革。

天鹅绒革命

著名的天鹅绒革命开始于11月17日。这天是布拉格学生反抗纳粹德国占领的60周年纪念日，数千名大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他们在民族大街(Národní třída)上被警察给拦住了，于是学生们原地坐下，高喊“我们不要暴力”、“我们手无寸铁”等口号，女生们则拿着一枝枝鲜花递给面前的军警们。但当局依然命令警察们收紧包围圈，接着警棍便如雨点般砸了下来——和1939年的盖世太保们做的一模一样。此次镇压造成了20人受重伤、51人轻伤。

第二天的官方报纸还对这次学生游行予以了谴责。但此时的公众情绪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当晚布拉格的演员工会就宣布举行罢工，以抗议警察的暴行。接着，罢工行动开始迅速席卷全国。报纸和电视台的不少工作人员已经不再听从上级的命令，自行报道了镇压的真相，进而引发了15万人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的示威。一周之后，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公民论坛”号召全国总罢工，并召集了多达70万人的集会示威。

当时很多著名歌星影星都积极参与到了这场革命当中，他们随同学生们一起乘坐大巴到各乡镇传播信息，并建立起“公民论坛”的基层组织。工人们逐渐了解到真相，转而开始支持民主运动，这成为这场革命的关键转折。这期间捷共领导人米罗斯拉夫·斯泰潘(Miroslav Štěpán)曾

亲自去到一家大型工厂，试图阻止工人们参与到民主运动当中。但他的发言还没讲完就被工人们嘘了下去，他只得悻悻离开了工厂。

捷共的组织架构在那短短的两周之内受到很大冲击——党内与苏军紧密合作过的高层领导人瓦希尔·比拉克（Vasil Bilak）和阿洛伊斯·英德拉（Alois Indra）都被开除出党，另一位颇有权势的领导人阿洛伊斯·卡佩克（Alois Kapek）则干脆选择了自杀。后来发现的资料显示，他原来是当年苏军入侵的主要合谋者之一。全国范围的政府大楼都不断地发生着火灾，当消防员抵达现场的时候，往往看到大火中央是一堆正在熊熊燃烧的档案文件。这其中最为繁忙的还是秘密警察，因为他们需要烧毁的资料比别的部门要多得多……

以拉迪斯拉夫·阿达麦茨（Ladislav Adamec）和马里安·恰尔法（Marian Čalfa）为首的捷共领导人代表团不得不与“公民论坛”的代表们举行了谈判。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双方就达成了于年底举行公开的总统选举的协议。12月29日，反对党“公民论坛”的领导人哈维尔当选新一任捷克总统，从而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和平转移，完成了所谓的“天鹅绒革命”。从此，捷克就义无反顾地走上民主宪政、市场经济以及“重返欧洲”的道路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天鹅绒革命期间，时年68岁的杜布切克也公开表示了对于“公民论坛”的支持，并于此后重返政治高层，

担任了国民议会议长。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杜布切克亲身经历了改革事业的挫败，并成为历史悲情的一个象征；但他又最终见证了自由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人生又可谓圆满无憾。

告别

在博物馆的一个放映厅里，循环播放着一段时长近二十分钟的纪录片，记录的就是从苏军入侵到天鹅绒革命这段时期的历史影像。应当说，布拉格这座历史博物馆并没有布达佩斯“恐怖屋”那样的精彩创意，其藏品展示的规模也相对有限。但这部纪录片中却有着诸多宝贵的影像资料，不少场景亦十分令人动容。在笔者看来，哪怕仅仅是为了这部纪录片，就值得来这座博物馆看一看了。

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笔者时不时就能透过窗户瞥见楼下院子里的另一个资本主义象征——麦当劳连锁餐厅，餐厅里的人气也明显胜过这座有些孤寂的博物馆。人们在露天的座位上手捧一杯咖啡，读着当天的报纸，享受着阳光。也许，麦当劳的食物并非那么美味，如今拥有麦当劳的日子也并非那样尽如人意。但捷克人至少记得，那段没有资本主义的日子有多么不堪，而阳光下这种自由宽松的气氛，恐怕就更是民主化之前所不可能具备的了。

夜晚，笔者徜徉于布拉格旧城错综复杂的小巷里，商店橱窗中琳琅满目的手工艺纪念品正争夺着游人的目光，这其中，就有着一排排制作精巧、色彩艳丽的俄罗斯套娃，只是，如今它们的面目已不再狰狞……[Q](#)

参考资料：

- 1、“共产主义博物馆”官方导览手册：《遗产》；
- 2、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3、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林骧华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



平生风义兼师友

——怀念张晖

撰稿人 维舟



3月15日清早07:49，张晖夫人张霖从北京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她再难克制，哽咽着告诉我：张晖快不行了。她说，你也不用来了，北京这里好多朋友帮忙，Suda怀胎六月，一个人带小毛，你还是照顾好他们吧，我就是告诉你一声，你也别和她说，免动胎气。

挂上电话我仍然脑中一片空白。我甚至连“节哀”都忘了说。到后阳台定了定神后，我和家里简短交代了下，往包里塞了两件衬衣先出门，在路上收到Suda发来的短信：能最快

到北京的只有11:30的飞机。我从来没有感到高空航行如此煎熬，因为我害怕他就在自己没有信号的那两个半小时里，无声无息地走了。

在一万米的高空，我遮住脸，任眼泪簌簌落下来。

我认识张晖已有二十一年。两人同岁、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我们都是农

村孩子，在十五岁进高中之前，我从未去过岛的东部，他也从没到过县城以西的上沙；并不奇怪，我们之间最初的话题是崇明岛各地的印象、口音差异以及各自的少年经历。

他自幼早慧，按年岁他原应低我一届（11月生日），但那时羡慕大孩子能背书包上学，哭闹着也要去；因为姑夫是小学校长，才容他提前入学。小时他喜欢听广播里的评话、小说，也喜欢文史，但十一二岁时大病一场，抢救过来后人似乎也迟钝了点，加上初中环境不同，对文史的兴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时还常感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对他一直青眼有加，俞老师很有才情，不幸当年填错志愿，抱恨不已；语文老师金长庚擅长隶书，但他对书法也并无兴趣。进初中后他长期只是班上的十几名，到初三才挤进前三，最后一次终于考了全班第一，随后在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上，成为他们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学的学生。

他对初中母校感情不深，原因是觉得自己受了不少冤屈——这一点和他爷爷、父亲相似，他们也性格刚直（日记1993.9.2，下引日记均为我本人日记）。他曾无故被从一等奖学金拉到二等。学校管理又极严，他有次参加直升生会议，仅迟到了一小会儿，便被校长骂得狗血淋头。入团也很迟，他们学校入团还要考试，他考得很好，却还是入不了，似乎是有人为了挫他的“傲气”，最后是在俞老师的极力争取下才取得的。

如果有人在那时预言他将成为古典文学方面的优秀学者，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大会相

信。事实上，在整个高中时期，他成绩最突出的倒是数学——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他以94分的成绩在数学这一科上列全班第一，高考时他数学127分，也高出另三科一截；张晖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峻、逻辑思考清晰的理科生，除了历史科优异外其它各科发展较均衡；不像我是个偏科的文科生。但入学半年后，在高一的寒假，他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寒假来后，我感觉他已变了——他变得无限热衷于文学。……他一天到晚地捧文学书、语文书，他总是询问关于古典诗词的东西。他和我变得沉默了，他把时间全用上去了。”（日记1993.5.6）

他最初的兴趣点是古典诗词。那时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约三千首唐宋诗词的本子借给他，他过了两三个月后才还给我。这一兴趣经久不衰，之所以是诗词，乃因它极凝练，每个字都可以反复读，而那时要得到一本书并不易，虽然那时也勉力找到了《词学》、《唐宋词十七讲》、《灵溪词说》、《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来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当时我觉得，想理解诗词难易，最好自己也写写试试。然而我们这两个乡下少年既无人指点，又找不到相关书籍，于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实行：两人开始一字字复原平仄，试图照猫画虎，但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字数填够而已；因而他最初总是偷偷写，不给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尔弄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事实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紧张的关头，我们都没有

停止填词——我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填词是7月1日，六天后就开始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对如何组织字词逐渐有了感受，慢慢写得像样了一点（因而更加“悔其少作”），这也是后来他对龙榆生兴趣的最初起源。

与此同时，从高一下半学期开始，他沉迷于《红楼梦》，为此极力搜罗红学著作；对钱钟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研读大略也始于此时。要得到这些书不容易，因而两人经常去学校图书馆，不方便借的时候就抄书；同时从杂志上了解动态及应该阅读什么书目（主要是《文学遗产》和《古典文学知识》）。想看又看不到的书，就照着书后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地址写信过去，询问有无相应书籍——通常得到答复后即便没有库存，也会随寄一份邮购书目过来。这种办法最初可能源自我们的另一个共同兴趣：集火花，因为那时乡下尚未普及液化灶，还都使用火柴。我们都曾给大理、长沙的火柴厂写信，有时十块钱就能买到几百张火花。到高二高三时，三不五时就会有他的邮包到（因为寄到乡下家里太不便，有时会在村里耽搁很久）。有一次他买了一本北京三联出的线装本《槐聚诗存》，薄薄一百来页定价32元，那时一本三百页的书通常也不超过10块钱，看到他咬牙买这样“骇人”高价的书，令全班都印象深刻；那时我就觉得他如果不为经济问题困扰，“日后当有所成”（日记1994.11.4）。

因为得来不易，他非常爱书，起初把每本书都包上书皮——直至他的书多到再也包不过来为止。高二有次我去他家时借了本《沧

桑艳》（丁传靖 注，陈生玺 笺释），那时我们对明清之际的乱世都很感兴趣，而此书中相关资料极多，我来不及抄，就用铅笔划在要点下，待回家后抄写。结果还书时他发现后一声不吭地拿橡皮使劲擦，某些地方我擅自更正书中印刷的错别字，他也埋怨我不该自以为是。到高三时，随着校图书室开架及周末去县图书馆越来越多，我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南明史的书，从司徒琳、顾诚各自撰述的《南明史》、柳亚子编次的《南明史纲》，到《永历实录》、《先王实录校注》。其中最打动我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那段时间我们都贪婪地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的兴趣更为分散，尤其高二时看了一些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张承志和顾城）和外国文学；他则对此毫无兴趣，除填诗作词外，对文学创作也无兴致（高中时他并不以作文好著称，他并非文人才子形象，而一直是精确、思辨的学者气质），甚至对宋代以前的古代史和古典文学的兴趣也不高，刚进大二时他来函说自己一直在考虑将来专业方向“现已决定学习唐以下文学：宋→近代”，其根由在高中即已埋下。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曾对我说，她觉得张晖“有点奇怪”，他语文成绩平平，但和别人不同，他交上来的周记有时像是学术札记，而不是类似“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事实上，班上不少同学或许也是这么看他的，到高二下半学期，全班尽人皆知张晖迷恋红学、钱学与古典诗词。前两者后来在他治学中隐而不显，但他从中却学到了很多方法论。

到高二，我们俩的成绩都出现了一定波动，但并未就此“收心”。虽然都清楚这些对考试几乎毫无助益，但这种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难以压抑，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一个减压阀——在应对考试之外阅读这些课外书，并不是“增加”的负担，倒更像是换脑休息。从高二起，我们在假期里开始以文言文通信——他先起头，但最初也不无游戏意味。我们那时的语文老师水平不高（有次她说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的是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这也使得我们只能依赖自学；由于完全没有参照，我们都以为这就是自然的状态，似乎本该如此，而内心深处又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处于什么水平。这使他高考前填报南京大学中文系时一直惴惴不安，他说自己如果侥幸入选后，大概属于中等偏下。

尽管对自我评价严苛，但他评价他人倒是常常冷峻、公正而坦率。高二时一次辩论，我方输了，他则认为对方四辩“气质、风度、口才之类”都比我好（1993.11.23日记）；另一次一个同学问他，我是否可能成为“大文豪”，他断然回答：“不大可能！”（1994.7.5日记）。在我沉迷于现代诗的时候，他告诫我“作文水平在上升，语文能力在下降”。我语文成绩虽不弱，但至迟到高三头上，他已取代我成为全班公认的古典文学方面最权威、准确的解释者。不必讳言，在那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我们之间既有相互督促、也有相互竞争，不过二十多年来，我们从未因学术之外的问题争吵过。

因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讷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实极易

相处，而内心极为丰富，是所谓“热水瓶性格”。有次他穿了件灰色的风衣，同学看上去像“大灰狼”，他也哈哈笑，从此这（以及衍生而来的“老灰”）就变成了他的外号；另一次同学看香港电影时发现某个角色像他，回来戏称他“大圈仔”，他也笑纳——多年后在香港，电话里他还笑着说：“如今真成了大圈仔。”他喜欢真诚朴实的人，待人也如是。不时还有些冷幽默。高二时第一次去他家，从镇上下车后往东走了好一程还没到，我有点沉不住气，问：“你家房子什么样子的？”他不动声色地指着右前方不远处一栋说：“就跟这栋差不多。”——事后很快发现那就是他家（1993.11.13日记）。又一次夜自修时，他问：“溜到外面去，老师要是查起来，有什么说法应付？”我随口说了几个，他笑说：“那好，我们出去吧。”两人便在小花园里土山的竹亭里聊到深夜（1993.9.2日记）。虽然身材高大，但其实常有孩子气的举动，坐在我后面时，课上还会用笔戳我后背或踢踢我椅子。又喜欢吃零食，生病了托我们带饭，单子上写的却常是杏仁、话梅、可乐之类。上大学后，他也常笑着说起南大的老师“可爱”、“不失赤子之心”，他之所以格外看重这些，大概由于他本人也正如此。

和有些学校不同，崇明中学我们那届直到高三毕业都未分班，直到高考前四个月半才正式要求每个人确定选加科目（3+1），但即便确定之后，三门主课仍按原班级上课，只有加的这一门才另外上课。因而虽然平时竞争极其激烈，学业重负，但至少一些同学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在那个黄梅雨季，高考的压力、前

途未卜的迷茫、青春谢幕的感伤……这一切同时达到高潮，久久不散。

那时我和他都是全年段九个班级400多人中选加历史的仅有四人之一。因此最后半年上历史课时，老师第一堂课先问：“我倒是要问问你们，为什么要选历史？为了你们四人，害得我还要备课。”其中一个女生说，因为她觉得历史可能容易考一点，她另外三门更差——这可能也是实话，不过好像让张晖听了似乎有点生气，摇了摇头。

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时他的理想是去出版社（尤其他心目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班主任觉得他考复旦历史系分到出版社应该没问题，但告诫他出版业不景气；他父母虽然向来开明，得知他想继续深造文史，其父也说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不过父亲考虑了一两天后仍尊重了他的愿望，认为“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家里的谅解让他

歉疚，他是独子，清楚家境一般，自己这般“任性”的后果如何。辗转反侧之下，一度他竟曾想放弃去考政法科，不过他又说到南京后“不买书叫我怎么活”；甚至说如果有了后人，也一定还是让他学文史（1995.3.8日记）。不过奇怪的是，他从未动摇去南京的念头，即便他那时认为自己将在异乡相当独孤——结果，这个预言最终没落在他身上，倒是落在我头上。

最终，他还是选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选了复旦中文系，原因之一是那一年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只招两人，我们都觉得恐怕不会这么巧刚好选中我俩。想好之后，他不再犹豫，他对父母心怀歉疚，但几乎把这看作了自己人生的宿命。2003年底，我到香港，他那时正在香港科大读博士，两人没有时间会面，就在电话里聊了三个小时。他说，到香港后令他感动的一点是：正因为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所以很多来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说自己。

二

高考的结果，他如愿以偿；我则一败涂地，被调去厦门大学读广告——当时第四志愿填厦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劝说：“去那也不错，郑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时钻研钱钟书著作，对率先提出“钱学”的郑朝宗也“爱屋及乌”。直到如今，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隐隐将他视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最后那个夏天的狂欢之后，剩下的是无尽荒凉。临别时，我对他说：“真个‘如今俱是异乡人’了。”他也有些感伤，回了我句：“醒来知是梦，不胜悲。”这两句都出自那时读过的韦庄词，那个“梦”，既是谢幕的一段青春期，后来看，也是一个理想。

他进南京大学时正逢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

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一旦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国内高中与大学教育脱节严重，而他则一直是在以读大学的方式读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觉地做好了准备——他甚至一直以为那是最基本的素养，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岛相见，他说，你信不信，南大读中文历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学前看过的课外书不超过十本；不知道“谭其骧”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别说“季龙师”这样的称呼了。他说，许多人对海内外学者十分生疏，“有一阵子我在宿舍里每天晚上滔滔不绝地谈文史及名家，他们几乎听傻了。”

南大的同学都很好，大二寒假回来，他住我家，一整个晚上都在谈自己在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把他们挨个介绍，形容得个个可爱，一直讲到凌晨四五点，俨然把我看作是他们的编外成员。他说很想带我认识他们每个人——我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些同学，竟是多年后在他的遗体之前。不过在古典文学的学术上，他当时颇有“独学无友”之感，在来信中说“有同学而无同志”（1997.9来函）。而我，那时经历重创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抑郁和自我怀疑之中，原先自己为之骄傲的东西，此刻一文不值，甚至被目为怪诞。他说，那时真该劝你也考南大——后来南大中文系在上海

实际录取了三个人，而另两个女生“高考分数都比你低”。他起初还只是试探性地问我“你以后还准备考研么？”既而说深知我家里不大会同我放弃热门专业而考中文系研究生，劝我不如也像个新闻系的样子“活活泼泼”，但他随后几年仍是越来越不含蓄地鼓动我考研考到南大去。然而我那时对自己丧失了自信，又知家境清贫，父母很难供养，最终还是决定先去工作养活自己。这一直是个使他失望的决定。

大学回岛的假期里，我把自己的《清诗话》、《请诗选》、《灵溪词说》等都送给他，他说：“你留着吧，你也要看。”我说：“这些以后对你比对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觉到我有放弃的念头，但还是不断地给我寄书，有一次竟让张宏生先生题签了《江湖诗派研究》寄过来。

进大学后他读书越发不可收拾。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有时吃饭都要叫他几遍才下来，甚至抬到他楼上书房去吃。老同学杨敏有时约他出来玩牌，他说正忙，杨敏啐道：“呸！看书还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4来函），“弟本愚钝之人，欲成一二，须下苦功。唯身边无知己，极苦闷也”（1997.10来函），“本学期来，弟在孝萱先生指点下开始读史……弟独学无友，虽间有所得而欲告无人，每长叹息，哀你我之分处两地

也。”（1997.3来函）

从当时的迹象看，他大一时对红学的兴趣仍未减退，因为他最初给郭豫适、吴小如先生写信，所问都是红学相关的问题。“今日又收到郭豫适先生信，见到了前辈学者谦虚的胸怀，极感动。弟亦要求上进”（1996.3来函），而吴小如先生在答复他俞平伯的问题后，又介绍施蛰存先生给他认识。1997年夏他南来厦门之前，特地去上海愚园路谒见了施老，施老要他遍读唐五代北宋词做根基、又嘱他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因为1941-43年曾在长汀厦大执教数年，还嘱他到厦门后多拍些厦大的照片看看。“日前得吴小如教授函，复印黄君坦资料来寄，又有照片附来，老辈提携后进，真不遗余力”（1997.12来函）。

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酝酿为龙榆生编撰一部年谱，尤其是因他大二头上时，“多日前弟得龙榆生氏主编之《词学季刊》一套，花四百圆方始买下”（1996.10来函）。给我的信中也越来越多提到各种要求：起初他对日本学者的方法感兴趣，要我帮忙统计白石词中色彩及音乐用语（因为他知道我最喜白石词，日后用作笔名的“维舟试望故国”就出自白石词），之后渐渐要我帮忙搜寻抄录龙榆生先生在厦门执教期间的文章资料、问我新买的《陈寅恪诗集》中1961-62年间有无关于龙氏小五柳堂的史料，如此等等。到1997年9月，他来函正式告知：“近来搜罗龙榆生资料，其人投靠汪伪，又为一代巨匠，颇值研究，弟欲为撰一年谱，短钉之业，聊遣时日，漫托心思而已，本不足详观细论。”两个月后他又来一函：“近

辗转与龙沐勋先生公子龙厦材联系上，如此可望于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谱成功有望。因作百年来词学研究者小传，整日屑屑为生卒年、著述等考订，颇乏趣味，时有不耐感……近日南京天气颇坏，或雪或雨，被困高楼之上，每日木木而已。”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话说，“弟之龙榆生年谱，杀青无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来越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98.3来函）这段时间，他假期回沪也会去拜访龙厦材及龙氏门人钱鸿瑛、徐培均等。从少年时读《唐宋词格律》起，他对龙榆生先生一直深感兴趣，那时真是进入到龙氏的生命中去了，故而得到龙氏后人全副相托；而龙氏的某些侧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和他一样，龙氏也自学成才、也体质不好，又有八个子女，一度四处兼课，苦苦维持而又治学不怠。当时有人著文说起龙氏只是“文化汉奸”，和我谈起时他说此论很“迂”，对当事人的处境实在体察太少。

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原先一直以为他是青年教师，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于当时有

人说“南大文强班出了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

不过这部年谱的写作也使他越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尽管张宏生先生等都在为他征集材料，但“大批书无法借阅（或新出版，或手稿影印、未刊稿之类），只能自己购买，经济上不堪重负。学问须金钱铺路，诚多体悟矣”

（1998.3来函），以至“七月弟亦拟实习，生存压力极大。弟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家父已辞职）……为之苦恼已久，胸中仍无主张……若放弃学术，就此工作，则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尘网，有何可言。今日方知晴雯之可贵”

（1998.5来函）——他提到这一句，是因为高中时，我最喜欢的红楼梦人物是晴雯，而他最喜欢的却是秦可卿。

在此之前，为了买书他已很长时间节衣缩食，极感拮据。有一次和我在上海汉学书店看到《藏园群书题跋》，标价28元，他取舍不决，便对我说：“来，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就买。”结果他输了，便沮丧地把书放回书架。那时原本早已约好1997年夏他们几个老同学来厦门游玩，在出发前三个月，他来信说海燕和杨敏早已打工筹措盘缠，他不能不来，“否则，将藉口钞票短缺，不拟南行。”那时海燕信上也说：“（晖）也在努力省钱，据他自称现在连书都舍不得买了（这一点我是比较怀疑的），估计到最后能省下两三百块钱，听他的口气似乎是绰绰有余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大概也就只能坐坐521次[慢车]了，而他，也只能靠游泳去鼓浪屿了。”最后能成行，也确实幸亏了杨敏早有准备、又慷慨解囊。

那年夏天临南下前夕，不凑巧遇山洪爆发，福建出省惟一的鹰厦铁路严重塌方；他和两个女生一路换乘三种交通工具（先坐火车到上海，换轮船35小时到福州，宿一夜再坐7个半小时大巴到厦门），舟车劳顿，在三天后终于抵达厦门。在此之前，我大学同学听说他们百折不挠坐船也要南来，都说他们“简直是疯了”。见面后他说，他们南下，主要是想看看我在厦门过得怎么样，说得我一阵酸楚。那几天，四个人在厦门过得极愉快。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四处走走，在鼓浪屿上懒洋洋地，一个个竟在郑成功像（那时我们发现这尊雕像很像高中的班主任）下睡着了。黄厝海滨那时还根本没有游客，仿佛海天之间只有我们这几人在。他脱了鞋，起初穿着袜子在沙子上走，被杨敏嘲笑后脱了袜子，小心走到齐膝深的海水中，忽而兴奋得大叫一声，我们不明所以，都大笑起来。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厦门的草坪上第一次听到了张霖这个名字。他说她的诗写得真是好。这次南来，张霖叮嘱他带几朵厦门的凤凰花回去。临走那天，我们站在凳子上，把楼下最后两三朵残余的凤凰花剪下夹在本子里。不久，他在来函中越来越密集地提到张霖的名字，到大三暑假，他给我看了张霖画的一幅“新儿女英雄传”，画着他们俩；画上的他捂着胸口，因为那时他有胃病。张霖对他无微不至，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是“年度最佳饲养员”，他慢慢胖起来似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这是我们在

少年时所憧憬的圣殿，进去不久他遇到一件事：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社里很急，他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到这里时边笑边摇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而一些人将学术资料俨然据为自己领地的做法，也让他有些愤然。数月后我去南京看他，他带我去“军俱”，那里的书市上书像白菜一样堆在地上卖，他笑着说：“震撼吧？我们当年在乡下对每本书那么宝贝，到了这里才真觉得书就是一种商品。”

话是这么说，他实际上从未停止求学的脚步，实习时仍不断搜集龙榆生资料。到8月，他接到张宏生先生来函，问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续读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他感动之余大为宽慰，那时学校也有意留他修《全清词》。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12来函）

那时我已毕业工作，在一家外资公司不辨晨昏地劳作，内心烦躁得几乎看不下任何书。我们平常的交谈渐渐地更多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关注，而非学术议题的讨论。到他研一快

结束时，他来信说决定有机会去香港继续读博士，“我过去太过拘束，信心也不够，现在我想凭自己的实力，无疑是同辈里的优秀人材，故要多争取机会，开拓自己”（2000.4来函），两年后，这终于成为事实。

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关注近代的女诗人、女词人。他那时曾屡次在沪拜访张珍怀先生。另一方面是因施蛰存先生早先嘱他关注乡邦文献，要他有机会校点《施淑仪集》；凑巧的是，龙榆生长子龙厦材的夫人正是崇明女诗人陈乃文（也是施淑仪女弟子）之女。他曾说自己祖上是在徽州的账房里做的，但落籍崇明早已有十几代人，自然对崇明感情至深；在高中时代我们就曾注意到崇明岛在明清时代系属长三角一带相当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大三时他和我信上说起“吾乡文风不振，甚可悲也”。这份持久关注一直未变，直到去年夏天他还特地回岛，与县志办约定陆续推出“崇明文献丛刊”，初定第一批书目是王清穆、陈乃文的集子，他事先跟我打招呼：“这样的活吃力不讨好，通常没人做，交别人又不放心，你到时也认领几本吧。”

我虽然也一直关注这些，但内心也有严重的幻灭感。有次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一次，在南京书市，听到旁边一人询问《钟蝶诗品研究》，很内行，让我心头一震，那本书只印了不到一千册，远不如《禅与诗学》畅销，可是张伯伟先生亲口说，在自己作品里他更重视前者。这样

的读者就是我们的希望，哪怕很少，也够了。”
他说，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

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三

大学毕业前夕，我也陷入了爱情。第一次带Suda去和他们见面，是在老同学的交大宿舍里。地方局促，不得已他和张霖坐在床铺上，我们几个则坐凳子。Suda稍有些拘谨。张晖转头笑着拍拍张霖的手背说：“他们都坐凳上，就我们坐床上，好像他们是来闹洞房似的。”一时哄堂大笑，气氛随之缓解。事后他私下说，他其实原想给我介绍一个北京女生，到时“我们一起去北京”，但慢了一步。现在看到我们开心，他也很开心。我知道他对我仍未放弃，虽然那时连我自己都几乎已放弃了自己。

那些年见到我，他还是照例会说：“你不读研，实在可惜！”后来改成说：“你养活自己后再读也好。不过最好快些，再过五年，很多领域的空白恐怕也填上了。”又后来则问：“你打算几岁重新读书？”我说，到三十岁再决定，有点积蓄我会更有安全感。他难掩失望，说：“多少钱都不能带来绝对的安全感。你生活越来越优渥，便越来越难放弃。”他说的是对的。四五年前在北京小聚，他又问：“你还要考研吗？”张霖在旁说：“考什么呀，人这样不挺好？”他笑了笑说：“你晚几年也不要紧，到那时来做我的博士生好了！”张霖说：“越说越孩子气了。”但我觉得他是认真的。

林中路。从高考结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

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种歧路之感，无时不笼罩在我心头。在大学毕业前夕，张霖写信给我说，人生本有不同可能，“我真不认为你的生活和他的选择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晖的运气并不比你好，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尝试和选择，而晖继续下去，就是无路可退了。如果成功了，他与现在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如果不成功——你有无看过哈代的《无名的裘德》？那是太过凄凉了，虽然这样的人生很有些悲壮的味道。”话极实在，但或许我就是因为常有为自己留后路的想法才瞻前顾后，而做学问，有时是不能给自己留退路的。

他自然也有郁苦的时候。1997年秋，就在他第一次来函告知我要撰写龙榆生年谱后，他忽又接了一段“年来札词，了无心得，可悲。施蛰存老嘱遍读唐五代北宋名家词，吾意纵通读一过，又如何？不如做些花巧活儿，沽名钓誉。此气话，但读书过累，又无人作伴，不免有些胡思乱想。”只是这些念头闪过之后，他依旧向前。有次和我叹息，校点一万字才十块钱稿费，话锋一转，他又说，这也是最练基本功的，“天下多少聪明人，千万不可存侥幸之心”。有时稍有松懈，又惕然警醒，因“伯伟师极刻苦，弟无偷懒之理”，一次“开学甫始，伯伟先生特地找谈话，反复叮咛英语要狠抓。

弟赧颜无以为报，深愧有负师恩”（1998.3来函）；而“宏生师亦耳提面命”，一次批评他浪费心力于旁务，要他致力研究“经学与文学的关系”。

在南京的七年，除了独学无友之感，他生活上总体过得很愉快，尤其是有张霖为伴的后四年，虽然刚起初他也曾私下说，谈恋爱后愈发拮据，不过张霖高兴就好。也正因南大是这样一个伊甸园，结果与外界落差很大，临毕业时不免有种“赶出园子去配人”的感觉。多年后张霖说：“我比他好，因为我去中山大学，比他幻灭得早。”张晖那时则去香港科技大学，师从陈国球先生，那里的学术环境也很单纯，在香港的三年半在精神生活上是他相当愉快的一段时光。并非不重要，物质上也空前缓解，因为那时他每月有一万五千港币的奖学金。2003年时我的薪水才及此一半，他电话里得意地说：“你看，读博也能赚钱，比你工资高吧？哼！你也来读吧！”

香港时期也是他学术视野发生变化的一段时光。但正如他写龙榆生扎根于高中时的积累，香港时的变化也来自南京时期。他原用力最勤的是词学诗学，但大二时随卞孝萱先生习诗文互证之法，施蛰存先生又叮嘱他“必先求博，后求深”；最重要的是，南大文强班开办的宗旨就是打通文史哲（因而张宏生先生嘱他注意经学与文学关系），加上香港时期导师陈国球研究的是文学史，遂使他逐渐思考“诗”、“史”、“文”这数者之间的关系，这或许也是他博士论文以“诗史”为题的来源。

多年后有一次，他向我感慨，“真的‘词乃小道’啊”，还是要跳出去看更大的世界。另一次又若有所思地突然来了一句：“历史毕竟还是浅。”在他看来，人最深的感情还是得以文学来表达。何谓文学？一切文字皆可为文学，但具文学性才能深深地展现人性。文学不是一个狭窄的学科门类，乃是弥漫于文字世界的一种方法。他说，这其实不是新想法，中国人就是这么想的，他们眼里的世界是一个文学化的世界，红楼梦中人就是通过诗文来欣赏自然，自然本身无所谓美不美，但再现它的文字就美了。你把左传、史记当散文来读，它们也就是散文；《诗经》是“诗”还是“经”？诗史是偏重“诗”还是“史”？文学史是偏重“文学”还是“史”？他虽然学习诗文互证、文学史，但他反对就文学史而说文学史，尤其反对把文学仅仅当作文献、文本来读（这一处大概受到他少年时致力红学时所见），历史大背景、思想史确实须知道，然后再以文学眼光解读文学，读出不同的内涵来。

那时我们渐渐开始感觉看不见对方的生活。2002年左右，我开始在网上写一些谐谑短文；有次回来，他读后哈哈大笑，随即说：“少写点吧，写多了笔会滑掉。”在此之前他也批评过我的诗词“兄作轻灵有余，稳重不足，才子积习也”（1997.4来函），虽然不时也有肯定，不过他通常是个严厉而坦率的读者。大致也是那时，我说起想把金庸武侠小说画成历史地图，他大感兴趣，极力鼓励我写下去，我说：“这也就博人一笑，似乎也没什么意义。”他笑说：“有没有意义不是作者说了算的。”我后来写的有关武侠的札记，最初就是来自

这一想法的副产品。高中时我们都曾对武侠小说感兴趣，有时开玩笑都用到其中典故。一次他来函说到“事情慢慢来，总有大功告成的一天（我想起了韦小宝和双儿，不敬不敬，一笑）。”去年和他说起沈书枝的文字让人想起在乡下的时光，“她还是你们南大中文系的”。他说：“哦？是谁的学生？”我说是冯乾。“原来是冯乾的学生，哼，要是下次见到，快叫师叔！”他又腰假装出恶狠狠的样子。因为冯乾和他都曾师从张宏生。我笑说：“你怎么一副南海鳄神的样子？”他绷不住大笑起来，摇头说：“我们这行规矩最多。”

那几年，从经济和事业上说，我的生活逐渐安稳和好转；然而从读书的角度来说，则日渐进入到了谷底。到2004年夏，回头一望，身后是一段长达九年的荒芜。也是在那时，他告诉我开始写博客，记写短札。由于太忙，他在blogcn上的博客没持续多久，却意外地给我的人生造成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博客仅仅是日记私事，甚至Suda去浏览别人日志我还嘲笑她在偷窥别人生活。至此我忽然意识到博客可以有别的写法，于是在他开博之后不到十天，我也开了一个。不过起初仍未认真对待，有次跟他说，写博也就是抖个小机灵，谁会花超过两个小时去写一篇博客？他笑了笑说：“那你也可以抖大机灵、花两小时以上去写，又没人禁止你。”

不久我写了一篇《文人旨趣和姜夔词的地位》，大意谓姜夔“清空”的风格及其地位之高，实上与整个文化的内省化有关，因为这种“变实为虚”普遍见于各艺术领域，以往仅从

文学而论是见树不见林。他留言道：“看到很多闪光的思想，不过写论文写惯了，不免觉得不严谨。可是严谨的文章没有这么多火花啊。哈哈。你的火花多多的，我以后有空把它们来详细证明证明。”这篇文章如今看来确实非常粗疏，即使如此，我之后几年也几乎再未写过古典文学有关的文章，因为我兴趣太过驳杂，此时自居为野狐禅，更无顾忌，从史学逐渐顺藤摸瓜蔓延到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去，对古典文学极少再去触碰，我们感兴趣领域的交叉反而比以前少了。有次我说，我术业无专攻，随便读。他说：

“你不是专职学者，心态放平当然也好，可是你到五十岁也这样？术业无专攻不是借口。”

2005年他终于博士毕业。去北京工作时却遇到些波折。原本一家知名大学的国学院已确定了他，中间却横生枝节，他为此不得不从香港飞北京加一次面试，虽然最后还是确定要他，但他不免兴味索然。恰好那时蒋寅先生带他去看社科院，他一看里面的书库就被迷住了，最终还是去了社科院文学所。问他月薪多少，他笑着说：“你猜猜看？……两千。”文学所很穷，不像语言所——语言所编《现代汉语大词典》每年有巨额版税收入，按当年丁声树先生定下的规矩，归所里分配。有次语言学家张振兴先生就惊诧：“你们文学所这么清苦？像你这样博士毕业，到我们所一般月薪八千起。”张晖笑笑说：“也有人写小说补贴收入。”老先生说：“那你也写嘛，写小说谁不会？”张晖笑起来：“我就是不会。”

到北京后无处安身，夫妻俩一度只能住在张霖的教师宿舍里。之前三年多两人分隔

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虽然不算远，但总不是一个城市。然而回京不久，张霖被学校调去韩国教对外汉语，一年后她刚回来，张晖又去新加坡做访问学者，而新加坡回来后不久又去了台湾“中研院”读博士后，直至2009年初才因给祖父奔丧而回来。他也不喜欢聚少离多的日子，但他说，出去一是开拓眼界，二者对纾缓经济压力也不无小补。2009年5月他们本科同学十周年毕业聚会，他一度还不大想去，因为觉得这些年没混出什么样来，羞见师长。

不过他的大量作品也正是在这时开始酝酿的，包括他未刊稿在内的十本著作、整理集子中，倒有三分之二是在2010年之后的三年多里密集地出版和写成的。如果不是此前的积累，很难设想这样的产出。蒋寅先生曾公开说：“张晖是世界上最好的助研”，可他尽管是“最好的”，多年来却仍然一直是“助研”。另一次所里领导说“张晖过来，是文学所的福气”，也不免招来物议。一次与硕士导师张宏生先生重逢，张先生赞许自己的学生是当代优秀青年学者，他苦笑道：“人人都这么说。”

在北京的这最后四年，他过得并不轻松。他虽然也做古籍校点和文献学意义上的整理，具一流的文献整理功力，可他却怀有一个日渐增长的“异类”抱负：不把古典文学视为已死的文本、文献，而是仍具有鲜活生命力

的、能感受当时人呼喊与悲喜的文学。作为一个自幼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对自己遭受到的误解难以超然，相反，他内心久久难以平息。

去年春，我到北京出差。他听说我从未去过颐和园，便陪我同去。那天春光明媚，天清气朗，昆明湖边游人如织。他指着一处地方说：

“王国维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我说：“怎么也没立个碑？”他说：“立了又如何？记得的自然记得，不记得的立了也没意义，如果只供游人摆个pose留影，还不如没有的好。”一路望佛香阁走去，他问我孩子好不好，然后说：“你也不会再考研了吧？”见我语塞，他黯然说：“等下一代吧。”在多风的山顶上，说起少年往事，那时我们还在人生的分岔口，他说：“你知不知道萧伯纳有句话？‘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是你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第二是你得到了’。你大概就是第一个悲剧，而我则是第二个悲剧。”我隐隐有些不安，说：“你怎么了？”他说：“你不在其中，很难体会的。”我默然片刻，说：“求仁得仁又何怨？我跟你换吧。”他说：“是啊，无可抱怨，不过，要换也要等下辈子了。”

他眼望着昆明湖上空，神情萧然。直到读到他的遗作，我才知道，我所看到的明媚春光，在他眼里却是“无声无光”。一年后，在他逐渐变冷的身体前，想到这份迟来的理解，我一时有泪如倾。

四

三个月前的隆冬，他到上海开会，说想来我家看看。我得知他日程很紧，从复旦到我家

要横穿整个上海，就说不如我去见他，他在电话里笑着说：“你以为我要见你？我是要见见

小毛。还是我过来吧，这么冷的天别冻着孩子。”他跟孩子玩似乎颇有一套，小毛很快跟“老灰叔叔”熟了，要拉着他蹦蹦跳跳。他笑笑，坐在沙发上有些乏力。我问：“这几天开会很累吧？看你也没睡好。”他说：“嗯，最近事太多。”我说：“那就推掉点吧，一年年纪一年身，别那么拼了。”他笑笑：“趁年轻时能多做点吧，免得老了后悔，你不也是这样？”

他带了一本新出的《中国“诗史”传统》，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大量改写后出版的。他淡淡说刚评上了副研究员，这是对他成绩的认可，但职称常常也并非只是单纯对学术成果的认可。他走后，张霖说起张晖出了七八本书，希望能给他个荣誉，我听到有人踌躇着说：

“年老的学者身故，这比较容易；年轻的就有点难。”

那时《龙榆生全集》也基本编完了，还有另一本待出的《无声无光集》、南社的一堆事（他是南社秘书长）、《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陈乃文的集子等崇明那边确定后也要提上日程了。不过那次他并未提及自己已经在着手写的另一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作品：“帝国三部曲”，第一部是《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自高中时代起，他一直对明末清初的那段乱世感兴趣，在中研院的博士后研究的又是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他近年在南社任秘书长，而南社本身正是起于清末时对南明史料的重新发掘——龙榆生一脉的词学其实也是清末才复兴的，皆与时代密不可分。事后我听他在北京的至交曾诚说，其实这才是他真正想写的东西：他要在那个宏大的背景，用文

学的方式来解读文学，把握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诗词能更多层次地展现其情感的丰富性。草拟中的第二部则是《帝国的风景》，试图将原先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康熙、乾隆与臣下的酬唱诗歌中见到政治世界的心跳——这大概是被北京这个城市锻炼出来的敏感。第三部《帝国的记忆》则还只有初步构想。

在整个春节里，他都在赶这部《帝国的流亡》，他想趁假期的时间把它做完。白天有孩子无法安静，他因而一连数日都在通宵干，把整个夜晚变成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家里人谁都劝不听，他妈劝他休息，他便说：“你别烦，我知道的啦。赶完这一阵就好了。”后来张霖说，做南明文学不祥，满纸都是流亡、战乱、死亡，今年又是他的本命年。



在最后这半年里，他可能久已感到疲累。积劳积郁。如他书房墙壁上的那幅字所言，“何以解忧，惟有读书。”他在这段时间里经常感冒发烧（事后才知是白血病侵蚀体质引起的），但他并未当回事，张霖劝他歇息，他说：“感冒咳嗽又不是大事，一阵好一阵不好，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他也曾牢骚说“多做多错”，但事实却是给自己堆了越来越多的任务。

这半年里家事也颇纷繁，包括换房导致的旷日持久的纠纷，虽然结果尚算合意，但过程着实漫长而痛苦（换房后只换了门，没钱装修，因而病因不是甲醛）。而他，却并不是一个善于卸掉自己负担或发泄出来的人，而会选择藏在心里，为了纾缓房贷压力，还做了许多额外的工作。在出事前夕，他校阅完了《无声无光集》最后的稿子，和张霖略微牢骚了句，说自己近来出的两本集子封面都太素淡，为什么古典学术的书封面一定要这样？他喜欢“洋气”一点的。我后来还说，既“无声无光”又“洋气”，那不就是闷骚了？张霖说，没错，他就是闷骚。

3月8日，星期五。这天早上起来，张霖发觉他脸色有些灰暗，嘴唇有些发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依然说没事，第二天还去参加个重要的研讨会。但那天他没和张霖同床，说怕感冒传染了她——可能他那时已相当难受，但还是撑着；而张霖那几天因为也忙着家事和上课，又有谁会往最坏的方向去想？到3月13日一早，早晨起来张霖看到枕巾上有血，问他怎么会事，他说是牙龈出血，继而感到腿也有些僵直，起身后发现看东西也有点花——实际



上是眼底出血。因为张霖那天要赶去上课，他自己去看了眼科，医生检查眼睛的结果认为无碍，静养即可，那时他还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休息一阵子了。

3月14日周四，一早起来后他感觉疼痛难忍，问他是哪里疼，答是“浑身疼”。到下午突然昏迷。送到人民医院，已是晚上六时许。他虽然有些不支，但还能自己走进去；但很快他就走不动了，找了辆轮椅来，结果在轮椅上都坐不直，整个人都瘫软下来。张霖呼唤他的名字，他虚弱地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是他生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他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推进重症监护病房，躺下后不到五分钟，他就开始浑身抽搐，颅内出现大面积弥漫性

出血(DIC,这是急性白血病的并发症)、皮下出血。虽然血量并不大,但因为是在最关键的脑部,血进入脑室后形成脑疝,压迫中枢神经,遂迅速引起呼吸衰竭,陷入深度昏迷。此时惟一的办法是开颅释放压力,但因为急性白血病,他体内血小板很低,又是大面积弥散,冒险开颅的最好结局也只是成为植物人,不像内脏出血还能撑几天。由于在脑部,衰竭极快,仅两个小时,医生已诊断他脑死亡。那时他父母和孩子都还远在崇明岛,他原说3月底到杭州开会完再接他们一起回京。

3月15日15:02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正遇到北京两个脑科的顶级专家在会诊,结论和前一天晚上所得出的一样:脑死亡,已无进行手术的意义。我看到他如此无助地躺在重症监护室狭小嘈杂的走道边的病床上,一双手仍然温润,但指甲已失去血色。除了皮下隐隐的血斑、嘴角的血迹和插满的管子,他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在熟睡,只是无法再醒来。曾诚对我说:“我感觉非常的不真实,那个插着管子的人不是我认识的张晖。”这像是一场不现实的噩梦。而它竟然是真的。张霖靠着我哭着说,我可怎么办啊。我拍拍她肩膀,语无伦次地说:

“节哀,节哀,说不定还有希望。”转过身面对着墙角,我泪如雨下。

他父亲来时,哭喊着他的名字,他似乎知道亲人赶到,坚持的最后一口气松懈,屏幕上的脉搏从150多次骤降到40多。他的生命体征愈加微弱,虽然胸腔似乎还在起伏,但那已经不是他的呼吸,只是呼吸机所呼入的空气。他母亲趴在他身上哀哀痛哭“心肝啊,我的心

肝”——对旁边许多人来说的这种无法理解的方言,在我耳中则是一位母亲最痛楚的呼唤。下午16:26,他的心脏也永远停止了跳动。他累了那么久,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跟着死去了。

才两岁的张贞观在病房门口也大哭起来。他还不大懂,说要回家去。虽然没人跟他说,但到晚上时他忽然说:“爸爸没有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就说:“爸爸没病了。”张霖说,大概是他爸爸托梦给他的。

从他进医院到最后穿完寿衣,整整24小时。很久前他曾对张霖说过,“如果我走在你前面,也不会连累你的”,回忆起这句不祥的讖语,张霖悲从中来,哭着说:“你怎么这个也要好强啊。”

他最后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我想,他如果地下有知,此刻他不是痛苦或恐惧,而只是无尽的遗憾。对妻儿与父母的遗憾、对自己未完成的人生的遗憾。犹如曾诚说的,他是一个那么有抱负的人,他真正想写的都还没写;如果能再给他二十年,他将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在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幻灭和失望之后,他原本已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在学术、人生和经济上都有望进入一个平稳期——一如张宏生先生所言,只要再过半年,一切都会好转。而死亡却恰在这个时刻不期而至。就像一颗流星,在即将发出最耀眼光芒的那一瞬间,骤然消失在天际。

曾诚选了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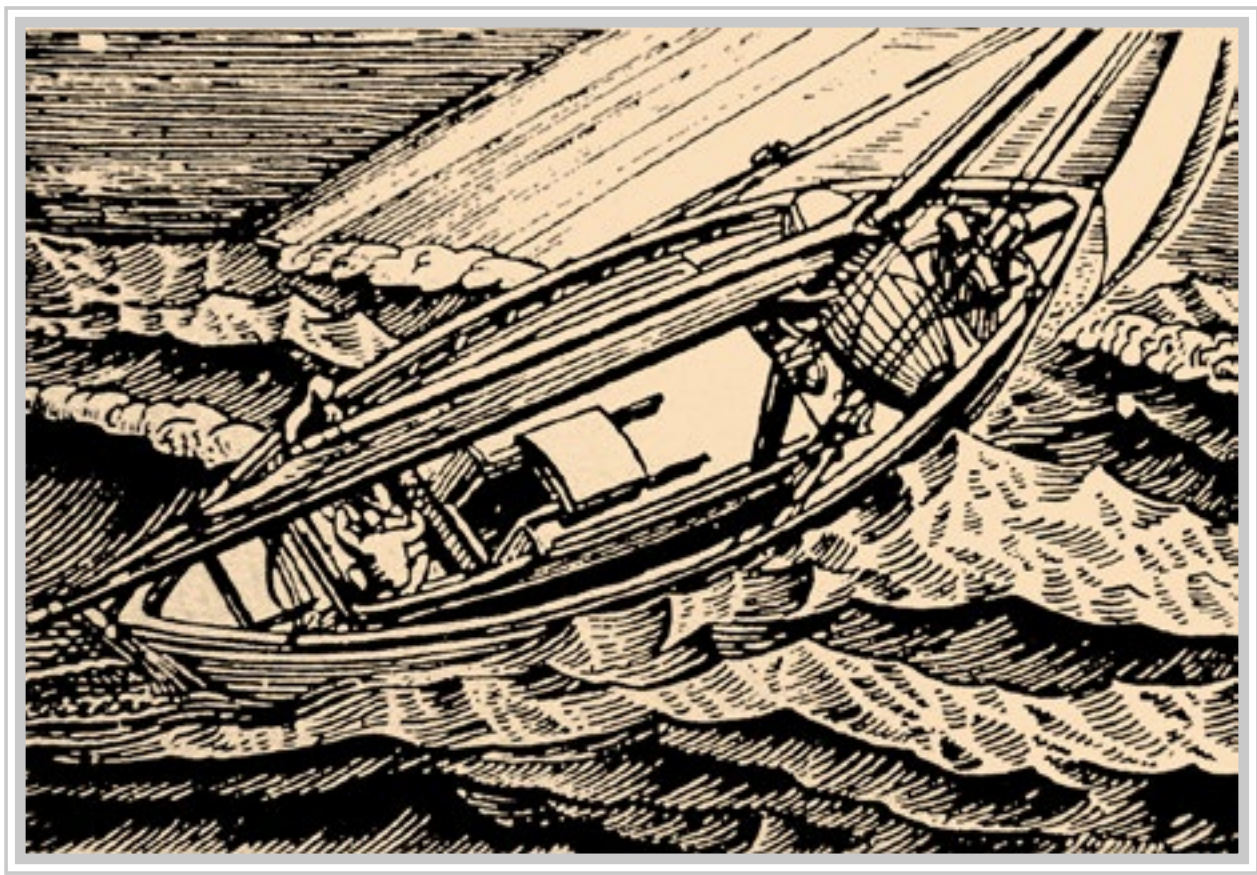
(D956)第二乐章作为他追悼会上的哀乐。那写的是一个年轻艺术家哀伤而短暂的一生中的坎坷与幸福。天才的舒伯特在31岁时早逝，去世前一年里，他谱写了其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这首弦乐五重奏；临终前他悲叹：“属于我的音乐，可惜没有时间写出来。”我想，张晖会喜欢这首曲子的。

那天夜里我难以入睡。在漆黑的房间里，我想起1992年10月15日，那天晚上夜自修时突然停电，一片黑暗中他在我背后镇定地叫着我

的名字，“走吧”，随即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我左手。迷蒙中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却只捞到一片虚空。我依稀看到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夜，几个少年躺在阳台上纳凉，楼前幽暗宽阔的运河水映照着天上的星河，我们躺在那，幻想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同人生道路；忽然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张晖笑着对我说，我再不会死了，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他不会再死，他已真正活过了。

我醒过来。在阳台上看看楼外，沉沉而无星月的夜里，依然是无声无光的北京城。Q





东北方 插图 肯特(美国)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